
【特别推荐】

- 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宋月红（1）
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辩证思维…………… 王炳林 徐春生（4）

【亲历者说】

- 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四次出国考察…………… 袁宝华（11）
农民“财政账本”内容的变迁 …………… 华兴福（19）

【史海烟云】

- 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始末…………… 张东明（22）
新中国第一路跨越巴山蜀水…………… 田 姝（28）

【人物春秋】

- 毛泽东：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胡新民（31）
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 刘 源（35）

【海外反应】

- 浅析兰德公司的中国军情研究 …………… 陈 晴 肖 欢（38）
美国联盟战略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 仇华飞（44）

【报刊荟萃】..... (49)

- | | |
|----------------------------|--------------------------|
|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历史人物的
策略、动因及危害 | 制度的变迁 |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
伟大实践 | △城镇化视域下的农村教育变迁 |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发展进程的
三次跨越 |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 |
| △从财政包干到分税制：发挥两个
积极性 | △我国体育治理的演进 |
| △改革开放40年财政政策对居民
消费的影响 | △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发展40年 |
| △中国与多边贸易体制关系的演变 | △1956~1964年山东省对苏劳务
援助 |
| △1953~1960年安徽农业“三改” | △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
|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督导 | △国防经济建设发展的时代特征 |
| | △1962年广东省“支援前线”运动 |
| |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对外援助 |
| | △中国参与中东维和行动的理念与
实践 |

【学术动态】

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 (56)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5期要目及摘要 (57)

《国史参阅》2018年要目 (60)

【特别推荐】

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宋月红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总结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对于人们更好理解这一基本国策的历史地位，对于在新时代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总体看，当前做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应着重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把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结合起来

在改革开放研究上，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通过歪曲、否定改革开放而质疑、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对当前意识形态工作构成严重挑战和考验。当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正确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深刻揭示改革开放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因此，必须注意把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与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结合起来。

意识形态对社会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具体体现。苏东剧变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在意识形态领域，西方长期推行“西化”、“分化”中国战略，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严重挑战与威胁。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实践，意识形态

或引导或反制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掌握了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既能巩固相应的上层建筑，也能破坏、摧毁与之相逆的上层建筑。改革开放研究政治性很强，必须注意其意识形态特性，及时反对各种错误思潮对研究方向的扰乱和误导。

历史经验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途径，做出了许多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也必须高扬改革开放旗帜，坚决反对在改革开放上搞虚无主义那一套。

党管意识形态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与根本原则，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遵循。党管意识形态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为此，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理论武装，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坚定“四个自信”，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指导意识形态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舆论导向。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对

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管好导向、管好阵地、管好队伍，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力、主导权和话语权。这些都是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中应该切实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中 始终围绕鲜明主题

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是十分丰富并不断发展的。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经验，需要把着力点放在科学揭示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主题上，深刻揭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把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同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结合起来，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结合起来，深入探索党领导改革开放的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改革开放历史经验。

从改革开放坚持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看，改革开放必须始终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机结合起来，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党做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一基本路线蕴涵着改革开放的两条基本规律，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能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如果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发生动摇，整个基本路线就会失去压舱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二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的关系，事关改革开放的成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坚持改革开放的根本政治前提，核心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面向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这是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经验。

从改革开放的领导力量和政治基础看，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执政能力建设，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核心在坚持党的领导。改革开放是党领导人民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党领导人民创造并贡献于人类社会的伟大事业。改革开放前无古人，前进中的每一步，无不面临各种矛盾问题，历经艰辛探索：改革开放

越深入，形势越严峻，风险越大，步履也就越艰难。

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党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执政能力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主心骨，始终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从改革开放的依靠力量和群众基础、社会基础看，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把维护和发展人民的利益作为改革开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共同富裕

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改革开放是人民的事业，是为人民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紧紧依靠人民，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改革开放着眼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围绕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而展开，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改革开放必须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决策的根本依据，使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步骤、每一项政策措施，都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和判断其正确与否、适当与否的基本准则，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改革发展为了人民、改革发展依靠人民、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把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和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光辉历史，是当前党史国史研究的重要前沿领域。改革开放好、社会主义好，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主旋律和主流意识形态，是巩固并进一步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政治基础。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需要根据改革开放40周年的理论与实践，加强理论研究、经验总结，探索和揭示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和思想状况，加强社会舆论引导，凝聚人心和社会共识，不断增强改革开放的政治定力和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坚定意志。

当前，改革开放史研究还不适应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需要，如关于党对改革开放领导的研究不够深入，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整体性研究不足，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研究尚不充分，依然有个别研究者用改革开放前否定改革开放后或用改革开放后否定改革开放前的错误倾向。

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属于政治问题的，必须加以批驳和抵制；属于认识问题的，则需要加以引导和纠正。认识 and 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史，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改革开放理论研究和建设，深入开展关于改革开放史的宣传教育、关于开创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成就的宣传教育，从中汲取改革开放的丰富历史经验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精神动力。

全面研究阐释改革开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国家建设和发展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历史性变革和成就，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意义和贡献

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理论体系的科学真理性、制度的优越性、文化的优良传统及其时代内涵，充分展现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智慧。

从大历史观和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视角，加强中国改革开放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比较研究，深入把握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方向、原则和道路，科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精神实质。

深入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深刻把握改革开放的历史方位和发展前景

历史和现实表明，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都给党和国家的发展进步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为此，需要深入研究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继承和发展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并结合现实情况，回答和解决改革开放事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矛盾问题，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历史依据和智力支持。

开展生动活泼的改革开放40年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使庆祝改革开放40年更好地贴近群众、贴近基层、贴近生活，巩固和厚植全社会自觉拥护改革开放、积极参与改革开放的广泛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把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同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结合起来，从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和问题入手，促进改革开放的“红利”不断释放，普惠社会和民众。既要阐释、宣传好改革开放好、社会主义好的主流意识形态，又要着力推进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实践，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营造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舆论氛围，把庆祝改革开放40年塑造成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的历史起点。（摘自《红旗文稿》2018年第16期，原文约5000字）

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辩证思维

王炳林

徐春生

改革开放40年来，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运用辩证思维等科学思想方法，观大势、谋全局，抓

改革、促发展，正确处理一系列重大问题，科学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

辩证思维是具有巨大科学真理性和 实践指导性的思想方法

（一）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思想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它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在相互作用的普遍联系之中，处在不断产生、不断消亡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永恒过程之中；世界充满着矛盾，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矛盾着的两个对立方面既对立又统一，推动事物的不断发展；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表现为从量变到质变，又从质变到新的量变的过程，采取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波浪式前进的路线。这就是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三大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恩格斯有句名言，“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以唯物辩证法为认识基础的辩证思维，从哲学高度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科学钥匙，在更高层次上对其他思维方式发挥着指导和统率作用，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

（二）辩证思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科学思想法宝

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身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是运用辩证法的大师，他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并运用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他的《矛盾论》等著作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经典文献。邓小平坚持

“照辩证法办事”，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原理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题，并运用辩证思维制定了改革开放一系列重大路线方针政策。江泽民把多掌握一点唯物辩证法作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条重要要求，他关于“十二大关系”的论述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系统阐述。胡锦涛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要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改革发展实际，切实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可以说，辩证思维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已经内化为党在思想和精神上的重要标识。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实践成就和理论创新，都是运用辩证思维等科学思想方法认识中国国情、把握革命建设改革规律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三）辩证思维是应对改革开放复杂局面和风险挑战必须掌握和运用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极为壮丽的事业，是一场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许多领域的深刻革命，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新实践。推进这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更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以照搬，必然面对许多不熟悉的情况、许多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党要担负起治国理政的历史使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必须以科学的思维方法为指导来认识和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粮草就是思想认识”。

思路决定出路，思维决定作为。改革开放的启动，正是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引发的思想路线和思维方式转变为先导的。回望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如果没有对辩证思维的自觉运用，就不可能实现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就不可能建立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也就不可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生机勃勃的大好局面。

改革开放进程中运用辩证思维处理重大关系、探索重大问题的宝贵成果

（一）在指导思想上，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党始终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曾有丝毫动摇。同时，我们党也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生命力。4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既不丢老祖宗、又讲出新话。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

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正是因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才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正是因为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我们才能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二）在党的基本路线问题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有机统一起来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坚持这个基本路线，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抓住了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这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原因。坚持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必须处理好它与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党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四项基本原则事关旗帜道路、前进方向、政权

性质，是立国之本，鲜明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开放是事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所在，是强国之路，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40年来，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坚持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和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中牢牢站住了、站稳了，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

（三）在发展战略问题上，正确处理发展速度和质量效益相统一

如何处理“好”与“快”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妥善处理了发展速度和质量效益的关系，做到了行稳致远。应当看到，我们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就决定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加快发展、尽快摆脱落后状态是我们面临的突出任务。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强调比较多的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经济，但始终没有忽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不但强调“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也强调“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随着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发展方式粗放、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严重、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日益突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问题越来越凸显。进入21世纪以来，

我们党先后提出又快又好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反映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和发展理念的重要转变，表明经济发展重点由重视速度，向速度质量兼顾、更加重视质量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不要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强调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表明，我国经济已站在新的起点、进入更高阶段，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

（四）在资源配置问题上，发挥好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作用

搞经济建设必须解决好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最有效地配置资源。能够对资源进行配置的力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市场的力量，另一种是政府的力量。对这两“只手”的关系，我们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改革开放前，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改革开放后，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十三大提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市场化改革轮廓逐渐清晰。1992年，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强调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此后，对政府和

市场的关系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论断,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40年改革开放、20多年发展市场经济的实践历程告诉我们,政府和市场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达到“琴瑟和鸣”的最佳效果。

(五) 在公平效率问题上,妥善处理 好先富和共同富裕的关系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讲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进和谐,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但对二者关系的把握,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重点,也就是说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并非一成不变。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水平低,主要任务是提高效率、尽力“做大蛋糕”,如果过于强调公平,结果只能导致共同贫穷。因此,我们党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方针。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整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针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现象,适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强烈呼声,我们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明确提出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

人民福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明确把共享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归宿,努力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特别是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举全国之力打响精准脱贫攻坚战。这都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

(六) 在社会发展问题上,促进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全部成果的总括和结晶。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确定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邓小平反复强调,只有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越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越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就越是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以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江泽民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空虚,社会风气败坏,也不是社会主义。”胡锦涛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40年来,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用勤劳与智慧创造了物质文明发展的

世界奇迹，也收获了精神文明发展的丰硕成果，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

（七）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贯通

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是改革与开放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相互激荡的历程。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开放也是一种改革，从一开始我们党就是把改革与开放作为相辅相成的统一体来认识、来推进的。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不断取得成就的重要法宝。邓小平早就指出，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又强调“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说来，都叫改革”。40年来，我们既立足国内不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激发全社会活力和创造力，又面向世界不断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深度融入世界。改革为开放创造了体制条件，没有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开放为改革开阔了视野、提供了经验借鉴，成为促成改革、推进改革的强劲动力。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扩大开放、以全方位开放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进入新时代，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也融入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遨游。习近平总书记更加鲜明地指出，“开放也是改革，要寓改革于开放之中”，“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并向全世界郑重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八）在改革的方法论问题上，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邓小平曾强调指出，“我们现在所干

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前人没有做过，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摸着石头过河”是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法，使我们在当今世界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的大环境下，始终保持社会大局稳定。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这就需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加强对各项改革关联性的研判，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把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有机衔接起来。要看到，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并非彼此对立、不可并存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强调顶层设计，就是要加强宏观思考、高瞻远瞩、整体谋划，增强我们推进改革开放的自觉和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

（九）在开放的原则问题上，在独立自主的基点上扩大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40年来，我们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敞开胸襟、拥抱世界，打开国门搞建设，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实施沿海沿江内陆开放，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从加入世贸组织到提出

并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的开放大门越开越大，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始终
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从不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绝不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绝不接受任何国家颐指气使的说教。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格局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稳了、走好了，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发展，而且为世界做出了中国贡献，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开放之路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核心技术的竞争更趋激烈，扩大开放仍然离不开自力更生。2013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指出：“现在，比较正常的技术引进也受到种种限制，过去你弱的时候谁都想卖技术给你，今天你发展了，谁都不愿卖技术给你，因为怕你做大做强。在引进高新技术上不能抱任何幻想，核心技术尤其是国防科技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人家把核心技术当‘定海神针’、‘不二法器’，怎么可能提供给你呢？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
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当然，我们不能把自己封闭于世界之外，要积极开展对外技术交流，努力用好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2015年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科院西安光机所时强调：“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科技人员要树立强烈的

创新责任和创新自信，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面向国际科技发展制高点，努力多出创新成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多作贡献。”

（十）在党群关系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相统一

改革开放是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内在统一，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亿万人民的探索与创新，汇聚成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在这一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坚持人民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与实践经验的“星星之火”，进行综合分析、科学决策、统筹部署，实现改革经验的提炼、升华，形成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发展政策，引领着改革的正确方向，不断造就改革的“燎原之势”，将改革推向一轮又一轮高潮。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既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内在统一的。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创造历史伟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汇聚起中华民族的磅礴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说，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胜利，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党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最广泛最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结果。（摘自《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原文约10000字）

【亲历者说】

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四次出国考察

袁宝华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77年，在一次会上，李先念副总理提出，搞经济工作的人应该到西方国家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他还指名要我出去看看。根据先念的意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先后四次出访，考察了英国、法国、日本、美国、联邦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较早派出的经济考察团。我抱着极大的兴趣，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管理体制、技术装备水平、企业管理情况和政府经济政策等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了解。通过考察，我打开了眼界，开阔了思路，感到对改革开放抱有的信心和头脑中的办法多了，路子也宽了，深感先念的提议深谋远虑。

首次出访印象多多

出国考察对我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这几次与20世纪50年代到苏联访问有很大不同。虽然都是“取经”，但之前我们是“白纸一张”，学人家只能“照葫芦画瓢”，这时不同了，我们已有30年的建设经验，看人家是怎样搞经济的，不仅有选择的能力，而且鉴别能力也有所提高，通过考察，能够很快找出需要我们学习的东西。这时虽然对西方国家了解不多，但在多年的民间贸易中也有所接触，只是我们这些搞经济工

作的人，很少对西方发达国家实地考察而已。当时，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实际负责人）袁庚说，国内一些同志是“关着门过日子”，怎知“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现在打开大门出去看看，还真是大开眼界。我们虽然搞了30年的建设，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但国力还不够强大，出去考察既是取长补短，也是相互交流。在与西方一些人士的接触中看得出，他们对我们更是“关着门过日子”，他们封锁我们，也封锁了自己。现在，他们也急于了解中国，想同我们做生意，但对中国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说明在这个世界上，交流比封锁、制裁更重要。考察和交流也是我们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好时机。此后多年，我也一直主张搞经济工作的人多出去看看，传递一些“中国信息”给他们。

1977年12月，我以顾问身份随同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率领的代表团访问英国和法国。这是我第一次出访西欧。李强是位老同志，多年从事外贸工作，很有经验，对国外情况也非常熟悉。依照当时的经济体制，国外认为中国外贸部部长就是中国的“大老板”，所以接待规格、日程安排都十分周到。随着参观考察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感到，我们和这些国家经济上的差距太大了。英、法人口都是5000多万，但它们跟世界经济联系密切，进出口总额都大我国十倍以上，它们经济发展的规模也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这两个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被破坏了的土

地上开始重建，为什么它们发展得这么快？我感触很深。在英、法的一些城市，也会见到一些贫民窟和以捡破烂为生或露宿街头的乞丐等，但整体生活水平是我们当时难以相比的。要是从所有制上说，这两个国家也都在搞国有化。英国当时由工党执政，他们还反复向我们介绍国有化的优越性。他们的国有企业也有亏损的，例如英国钢铁公司在与我们座谈时坦言相告亏损了，所以保守党一上台就以此为理由推行私有化。其实问题不全在国有化上。我们去法国时，法国也在推行国有化，而且国有化程度还相当高。巴尔总理是位经济学家，听了我们介绍“文化大革命”后经济恢复的情况，他很有兴趣。他在介绍法国经济情况时，特别讲了能源的重要性。法国煤、油储量都很少，主要是发展核电，所以他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法国的核电经验。他建议代表团参观里昂附近的一个核电厂，这是一个单机容量90万千瓦的核电站，核电设备开始是从美国引进的，后来由法国自己制造。据他说，法国核电技术优于美国。听得出来，他在向我们推销核电设备。应该说，他们很有商业头脑，那时就看到了中国是个大市场。虽说我国发展核电是后来的事，但启动、酝酿、研究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十年后引进英、法技术建设的大亚湾核电站，就是李强和我在那次访问时开的头。

对于环境保护，这些发达国家都比较重视。到钢铁厂参观时，很难见到烟火冲天、油灰满地，厂区、炉前区干净整洁。在英国，我们参观了矿井，据说这曾是英国女王看过的煤矿，长长的巷道干干净净，直到掌心才见到煤。在掌心面上的工人虽然个个也是黑脸乌眼的，但使用的是先进设备，可以保证生产安全。我一面看一面想：我们的矿工何时也能使用上这

样的设备？现在，这个愿望早已实现了。

我国与英国之间有个香港问题，所以建交较早，虽然停留在代办级，但相互贸易还是不少的，他们希望跟我们做生意。当时正有一笔大买卖，就是西安飞机厂准备购买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发动机。这是王震拍板决定的。李强和我到此访问，他们认为我们是“实权部门”的人，邀请我们参观罗尔斯—罗伊斯公司，还请我们观看可垂直起落的“鹞式”飞机表演，意思是想做成另一笔生意。

在法国，我们参观了图卢兹飞机工厂。当时法国想卖空中客车A-284给中国，邀请我们参观它的装配厂。空中客车飞机是英国、法国、联邦德国、西班牙等几个国家合作生产的，是后起之秀。在法国，我们还参观了农场，农业操作已经完全机械化了，看了机械化养牛和挤奶场。当时，英、法都有打开中国市场的强烈愿望，所以有关部门的官员、经济界人士对我们的访问非常重视。

在考察中，给我印象较深的另一个地方是英国首相府。唐宁街10号的照片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但真的到了这里，仍然感触颇深。堂堂首相府，除了门口站个警察，其他与两侧建筑没有两样。我们的车到时，主人在门口等候，也就是在大街上迎接。我们被引进大门，里面是个小过道，会议室里围着会议桌的座位可坐十来个人。这就是堂堂大英帝国首相府，我很惊讶。中国有句老话叫“官不修衙”。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我们的古人确实是那么做的，可我们一度是怎样做的呢？几乎是“修衙”成风！有的把政府办公楼装饰得富丽堂皇，像五星级饭店。不想20世纪70年代，我竟在英国唐宁街看到了“不修衙”。几十年过去了，据后来去过唐宁街10号的人说，那里仍然如故。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不修衙”，我想大概不是没钱。至于是重节俭、重传统、重实效，还是重表面形式，我没有研究过，但“不修衙”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英国，我们还拜访了前任首相希思。希思多次到中国访问，是中国的老朋友了，同李强很熟。他在家接待了我们。希思住的是公寓，像咱们的机关宿舍，一栋楼几个单元，他住其中一个单元，上下三层，每层有两个房间。他把我们让到第二层客厅里。希思独身，雇了个钟点工，白天在他这儿上班。我们是晚上到的，希思便自己动手煮咖啡招待我们。他的门口也站了个警察。他说，本来他不要警察，不想下台后有人滋扰他，不得已才同意内阁给他派个警察站在门口。据希思讲，他除了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外，主要是读书。希思虽然是“高官”，但不住“豪宅”，这给我的印象也非同一般。

此次访问中，我们还会见了撒切尔夫人。我是头一次与撒切尔夫人见面，她当时是在野党领袖。李强提出要到她的总部拜访，但她说自己是在野党，我们到那儿去有点太张扬了，所以坚持到旅馆看我们。于是，她带着“影子内阁”的“外交大臣”、“国防大臣”来到我们下榻的旅馆。撒切尔夫人很有点风采，侃侃而谈，给我们分析了英国政局，信心十足，言下之意，下一届的首相就是她了。

在日本“蹲点”

从英、法回来后，先念要我再到近邻日本看看。于是1978年11月，我带一个经济代表团访问了日本。

这次同我一起去的副团长有北京、天津、上海几位管经济的副市长，顾问是社

科院副院长邓力群，成员有马洪、孙尚清、宋季文、徐良图等，是一个近40人的代表团，代表团秘书长是张彦宁。日方由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出面接待。

为更多了解日本企业情况，我将考察团分为A、B、C三个组，这样可以多考察一些企业。对重点企业，我要求不能走马观花，少则三天、多则一周，听讲、座谈、调查。我在A组，先到新日本钢铁公司君津钢铁厂蹲了两天，邓小平不久前访问过这里。君津钢铁厂用的是海运进口矿，有自己的码头，设备先进。小平请稻山嘉宽帮助中国建一个同样的钢厂，这就是后来的上海宝钢。我在丰田汽车厂蹲点考察了六天，了解面广，感受也比较深，尤其对他们的发展战略印象深刻。那时还是20世纪70年代末，但他们介绍远景规划时，产品设计的新型号已经开始针对21世纪了，真的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想着未来的”，很不简单。还有丰田的“零库存”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丰田汽车下生产线后直接送到船上外运，为了看个明白，我从新车下线、上运输车（运输车一次可载三辆）到码头，一直看到一辆辆车开上货船，整个过程井井有条。丰田协作厂的协作件也是直接送到生产线上，仓库基本没有库存，所以叫“零库存”。生产组织到这种程度，长期管理物资工作的我看了之后非常惊讶，钦佩人家的管理水平。而且一个生产线上可以生产多种型号的汽车，这是一项科学严密的组织工程，他们叫“看板管理”。除此之外，我还参观了小松制作所，它的挖掘机与美国同类产品竞争得相当激烈。在参观松下公司时，松下幸之助已退居二线，总经理是他的女婿。我看了他们的一个电视机分厂，厂长说，他在这里已经干了几十年了。他说，没有一心扑在事业上的事业

心，是干不出今天的成就的。我读过松下幸之助写的书，知道他是从一个很小的电器商店发家的。夏普公司是我们参观的另一个典型，它走的是高科技道路，太阳能电池已经发展到好几代了。接着我们到九州，参观八幡钢铁厂。这是日本一个老牌钢铁厂，一座已退役的高炉没有拆除，别出心裁地在原地修建了一个小公园，以此告诉后来人，八幡的发展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要忘记创业的艰难。这种做法很有一番高瞻远瞩的思想！

我们到日本时，正遇上自民党总裁选举，福田赳夫、大平正芳、河本敏夫等人都在竞选。河本是通商产业大臣，为了助选，他和我握手时招来一帮记者给他照相。经济企划厅长官樱内义雄是我们熟知的老朋友，他自我介绍说，他的这条命是中国一位农民给的。战时他在中国负伤，在庐山附近被一位农民婆婆救助。他说他永远忘不了中国人民的恩情。我们访问了他领导的民间组织——日本科学技术联盟，听他讲了日本规格协会的情况。他还向我们介绍了专利管理制度，这在当时对我们而言是个新鲜事物，很有启发。

考察期间，正是日本的“质量月”，我们参加并体验了这个活动，听了一些获奖企业介绍经验后，还特地去考察了其中一些企业。他们不仅重视质量，而且重视节约原材料，重视成本管理和降低消耗。这是高质量的前提，也是企业管理的基础。这些企业的管理功底都很过硬。日本同行还介绍了他们发挥职工积极性、创造性的各式各样的办法，包括终身雇佣制、质量小组活动（即班组活动）、“提案”活动（即合理化建议活动）和为职工过生日（工厂员工的生日企业都有登记，到时由厂长或委托其他人登门祝贺，以激励职工）。通过这种细微考察，我们感到，日

本的企业管理很重视人性化的关怀。

访问结束时，日方为我们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上，有日本记者突然发问：中国允许不允许或者说可不可以由外国人去投资建企业？那时乍一听，觉得不好回答，我同力群、马洪小声商量几句，用了个外交辞令，我说：你的问题提得很重要，我们要很好地研究。第二天日本一些报纸上居然用了大字标题：袁宝华讲了，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好好研究。当时国内尚无“开放”一说，的确难以明确回答。回国后，我们向中央汇报了这个问题。不想，不到一个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回答了许多国外工商界人士最关心的问题。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

在日本，稻山嘉宽刚见到我时就说，他这一年接待了四个中国的代表团，作为经济代表团我们是第一个，他很高兴。日方为我们安排了周到的考察行程。通过考察，我们都觉得应当把发展商品经济提到我国经济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邓力群对我说，要发展我国经济，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不走发展商品经济这条路是不行的。当时对“商品”二字都很忌讳。回国后，华国锋亲自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我们的汇报，我们也在汇报中斗胆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展商品经济的观点。在当时提出这些问题，顾虑很大，时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人们的思想还在禁锢之中，所以我们在提出发展商品经济时，还特别强调两个界限：一是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二是货币不能成为资本。

汇报前，我们向国务院报送了30多页的《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报告结合我国当时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要解放思想，彻底摆脱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束

缚，打破框框，冲破禁区；要改革一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变行政组织管理为经济组织管理；要扎扎实实做好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基础工作，包括普及和提高教育，加强职工培训，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素质；等等。报告还指出，日本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并注意结合本国国情及文化传统加以消化吸收，创造了一套以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为中心的、使管理工作全面现代化的、适合国情的独特方法，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车轮。报告还介绍了日本公司的组织、企业计划、专业化协作、质量管理、职工培训、刺激职工积极性的办法和提高职工生活水平的政策等。

考察报告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观点。例如，要正确认识企业管理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企业管理的任务既应该包括合理地组织生产力，又应该包括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把企业管理一概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借鉴、不能学习、只能批判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要正确认识计划经济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既然存在着商品和货币，价值规律就起作用，应当利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结合起来。要正确认识公有制与竞争的关系，公有制经济也可以允许竞争，使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同时淘汰极少数长期吃社会主义、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企业等。国务院领导很重视我们的建议，立即将报告印发下去。

考察中，我们深感日本经济发展与其指导思想有很大关系。我们觉得日本的特点是政治思想保守，经济并不保守。发展经济时，他们采取“拿来主义”，拿来以后加以利用、创新，再变成自己的东西。譬如质量管理是从美国学来的，一直到现

在，它的质量管理奖还叫“戴明奖”。戴明是美国质量管理专家，他在日本传播质量管理知识，日本为此设立了这一奖项。之后日本又在美国质量管理基础上创造了全员质量管理模式，其实就是质量管理中的群众路线，即美国的QM（质量管理）到日本发展为TQM（全员质量管理）。日本还把中国“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拿过去，组织工人参加管理，提出了日本式的“三结合”。再譬如，日本的企业管理也是照搬美国的，他们从泰勒制学起，在学习过程中又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访日期间，日方为我们举行了几次企业管理讲座。其中有一讲是一位名叫金森久雄的学者介绍日本企业管理的特点。他说来说去，中心意思是日本企业赖以生存的是三大支柱：一是终身雇佣制；二是年功序列制，就是按年加俸，减少职工跳槽；三是独立工会，工会是企业自己组织的，不受外部工会的影响。其实，所谓三大支柱，后来也逐渐发生了改变。

美国的“拿来主义”

在考察了英、法、日之后，1979年11月，我又访问了美国。仍然是我为团长，邓力群为顾问，副团长有经委徐良图、北京叶林、上海韩哲一、天津张淮三，代表团成员有辽宁王光中、体改委周太和、社科院孙尚清以及张彦宁等人，基本是考察日本的原班人马。此行的目的是通过参观访问一些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工交企业、银行金融业单位、咨询公司和管理协会，考察美国的经济管理、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这次考察也是兵分三路，由徐良图带队到可口可乐公司，韩哲一带队考察飞机工厂。非常巧也极为幸运，我

们到日本考察是在邓小平访日之后，这次到美国考察又是在小平访美之后。我们感受到两国政治、经济、学术、企业界及公众对小平访问的关注仍在继续，“中国热”余温不减，我们的考察也自始至终处在友好的气氛之中。

我们是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中国经济代表团，成员又包括了京、津、沪、辽沿海工业城市和有关部门的官员及学者，美方接待单位很重视，工作做得比较周到。邀请我们的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菲利普斯，他原来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所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算是一个半官半民的组织。美国商务部、能源部、财政部的官员和国会经济工作委员会委员的成员也出面接待。在美期间，我们访问了华盛顿、巴尔的摩、纽约、芝加哥、休斯敦、旧金山、丹佛和小石城。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在小石城会见了我们。我们把这些城市的主要工业大致都看了，包括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机械制造业，也包括港口、墨西哥湾的采油平台，还拜访了美国大通银行和商业周刊杂志社。

看了这些城市和企业，给我的感觉是“拿来主义”的确在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普遍。美国人很善于接受、吸收别人家的东西。日本学习美国并加以创新，美国回过头来又学习日本，所以发展得很快。1979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他们的工厂管理还不大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1986年4月第二次访美，他们告诉我，已经学习了日本的经验，办企业要以人为本，要强调行为科学，了解人的需要，满足人的需要。美国人学得实在快，同时在学习中保持了自己的特点。

给我留有深刻印象的另一件事是他们不断采用新技术，改造旧设备。我们参观一家造纸厂，看到它的一台设备是20世

纪20年代制造的。我很吃惊：现在还用这么老的设备？经介绍才知道，关键之处已经多次改造，设备外壳虽是20年代的，但机内关键技术的水平却是70年代的，也就是不断地在旧设备上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利用旧设备可以利用的部分，改造必须改造的地方，既快又省。在接受新技术方面，美国人毫不保守，什么新的东西、好的东西都加以学习、消化、吸收、创新。我先后四次到美国，看到新东西不断涌现，所以它的经济能够发展得这么快，能从一次次的周期性危机中很快走出来，并不断改革、不断创新，在经济上、技术上一直能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施瓦布与世界经济论坛

1980年6月，我到瑞士日内瓦，访问了欧洲管理论坛总部。之前，论坛主席施瓦布曾应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所所长钱俊瑞邀请，于1979年来华访问。经社科院邓力群副院长介绍，施瓦布代表欧洲管理论坛总部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建立了合作关系。由此，中国企协每年除参加达沃斯年会外，还与论坛合作在华举办一次中国企业高峰会议，共举办过26次。这26次会议对外国企业了解中国以及中外企业家交流经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现在，他们已经采用在大连和天津召开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形式在中国开会。

作为一个国际性民间经济组织，欧洲管理论坛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起许多国家的重视，每年都有一些国家政要和学者、企业家参加其年会，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发表意见，交流看法。论坛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被誉为“非官方的国际经济最高级会议”，我们每年也都组织由企

业家、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会议。为发展我国在经济领域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国家领导人李鹏、朱镕基、李岚清、吴邦国、温家宝、李克强、习近平等先后参加过达沃斯会议。1987年，施瓦布提出，打算将欧洲管理论坛改组为世界经济论坛，以扩大它的影响，并为此征询我们的意见，我们表示赞同并予以支持。达沃斯论坛年会大都在中国春节期间召开，所以每次开会都会祝贺中国春节。

施瓦布比较有远见，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纷纷制裁我们，在反动声音甚嚣尘上的时候，他决定继续与我们合作开会。当时我给江泽民、李鹏写了报告，他们都很支持这个会议。当年10月26日，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举办的第九次企业管理国际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位外国企业家与中国企业家一起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江泽民会见中外企业代表，并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在政治风波刚过、西方造谣诽谤的“反华大合唱”十分嚣张的情况下，会议如期召开，让外国人看到了中国的真实情况，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世界经济论坛面向企业，1980年时与西欧2000多个企业建立了网络联系。在施瓦布案头的电脑里，可以随时点击他们中任何一个企业的管理数据。我们考察联邦德国，就是经欧洲管理论坛介绍，由联邦德国欧洲管理论坛方面的负责人接待。在联邦德国，我从南到北考察了他们的一些主要城市。接待方还邀请我到西柏林，告诉我说，联邦总统想在西柏林（当时首都在波恩）接见我。后来考虑到这对民主德国是个很敏感的问题，为了不引起民主德国误会，我和使馆商量，婉言谢绝了总统的好意。虽然他们因此降低了接待规

格，却避免了给我国外交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在联邦德国活动，主要的接待单位是商会（相当于我国的工商联）。我参观了西门子公司、奔驰公司，还专门去看了证券中心及股市。

联邦德国的企业管理同样非常严格，我很欣赏他们的职业教育制度。他们培养职工采取的是双轨教育制度，由商会负责组织，学校负责徒工理论教育，工厂负责岗位实习操作教育。他们重视手工技能操作训练，每一个徒工毕业时都要用手工做出一个纪念品，以展示操作水平。这样的徒工上岗后都是熟练工人。联邦德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废墟上恢复和发展得那么快？主要得益于这种传统的职业教育制度。他们说，战争炸毁了工厂，技术装备被毁掉了，但只要人还在，就有了重要资本，有了人就有了技术，也就有了迅速恢复经济的可能。他们提高职工素质从徒工开始，在职教育也从不中断，这非常重要。

我在1987年和1988年两次访问民主德国，他们也有这方面优势。当时民主德国人均国民收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最高的，大约是6000美元，虽说与联邦德国相比差距明显，但他们的工人技术素质并不低，这也得益于德国传统教育制度。两德之间的差距是在企业自主权上，民主德国企业的发展受政府行政干预太多，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质量脱节。民主德国人向往联邦德国，最重要的是生活水平差距所致。就以照相胶卷这个小小的产品来说，我在美国、西欧包括联邦德国考察时，彩色胶卷到处可购，可是民主德国仍然是黑白胶卷。其原因不都是企业技术不行，而是政府管得死，企业没有“自主钱”，限制了研制的积极性。

结束了在联邦德国的访问，我到奥地

利参加欧洲管理论坛专为中国代表团举行的一次国际讨论会。出席这次讨论会的有瑞士、联邦德国、奥地利和荷兰四个德语国家的有关人士，主题是外国企业怎样到中国投资办厂。会上，我全面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对外方针，并以瑞士迅达电梯公司和北京电梯厂合资组建中国迅达电梯公司的合作合同内容为例，具体讲解中国政策，引起与会四国企业家的极大兴趣。

要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管理经验

上述几次出国，虽然是开阔视野性质的考察，我的感受却颇多。看看人家，想想自己，深感思想解放的必要。没有思想解放，何来经济发展？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论经济管理、企业管理，都与市场分不开。有市场才有竞争，有竞争才能优胜劣汰，才能促使生产技术进步，才能给企业带来压力、增加动力。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没有创新，你的产品就不能吸引人，没有创新，你的产品价值就低，所以要不断创新。哪怕有一点点新的东西，都是进步，都能提高价值，都能有利于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应该得到支持。企业要在竞争中创新，在竞争中壮大。企业若想立于不败之地，关键是产品先要立于不败之地。好多东西，看起来是小改、小革、小进步，可是积累起来就会把整个事业向前推进一大步。我很欣赏一些优秀企业家讲过的两句话：“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生产一代，开发一代，储存一代。”如果说这几次考察还只能是走马观花，那么在“观花”之余，我还想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也是社会的公民，一定要在自己的产品质量、品种和售后服务上下功夫，这样才能满足社

会需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出国考察，对我们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者来说是很帮助的，因为我们考察的这些国家都有很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史，他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而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只有几十年，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借鉴这些国家管理经济的好经验、新方法，来不断调整我们的步伐。资本主义能够生存到现在并有所发展，就是因为它不断地调整，不断地采取新的方法来激发经济。对此，我们要深入研究与借鉴。

第一，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不断调整和建立起来的一套监督、管理企业的办法。就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它的核心是坚持私有制。在坚持私有制的前提下，他们的许多管理制度也在不断改革。资本主义开始时是由家族企业起家的，企业由家族成员管理，进而聘请专业人员代替家族来管理他们的工厂，后来很多发展为股份制，吸收了更多的资金，加强了对企业的经营监督。我们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他们的这一整套监督与管理方法。

第二，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多年来不断进行资源配置、资产重组的经验。资源配置和资产组合在经济发展中很重要。资本主义国家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企业关闭，又有数以万计的企业出现，资本主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存和发展的。而我们的企业一度“能生不能死”，一些长期经营不好的企业拖住了我们的腿，制约着我们的经济发展。所谓优胜劣汰，我们要研究和借鉴资本主义这方面的经验。

第三，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维护制度稳固、保持社会稳定的方法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高福利带来的问题。一些西方

国家为了与社会主义制度竞争，用高福利笼络人心，使福利增长超过生产发展的可能，造成国家负担沉重而陷入困境。对此，我们要认真研究。

第四，研究和借鉴西方企业职工参与管理的经验。我1979年到美国时，美国没有职工参与这一概念；而此前一年到日本，他们就已经大谈职工参与了。日本人讲，职工参与是他们从中国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中学来的。现在，职工参与、以人为本已经变成世界许多国家企业管理的共同语言，美国人在讲，欧洲人也在讲。从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中描写的工人作为机器零件的时代开始到现在，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而作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创始国，我们又该如何继承和发展呢？

第五，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在发展高新技术和推行科学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持续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断发展、采用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式。日本把发展高新技术提高到国策的高度，以保持在市场竞争力中居于领先地位。科学管理也在不断发展，开始提出的科学管理和现在提出的内容大不

一样，有很大变化和进步。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早已向国际化发展，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活动已不局限于一国之内，这同高科技发展关系极大，这方面尤其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说明，它是靠不断地进行调整来维持其制度、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的。列宁讲，资本主义制度是垂死的制度。他是从战略上讲的，是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来讲的。当然，它不断地调整，可以缓和矛盾，但基本矛盾是不能消除的，最后它还是要走向灭亡。我们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东西，研究它克服困难、化解和调和矛盾的经验教训，在学习的基础上加以借鉴和不断创新。只有创新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创新是我们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一套企业管理方法，既要总结自己的经验，也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不断改革，不断创新。（摘自《百年潮》2018年第10期，原文约13000字）

农民“财政账本”内容的变迁

华 兴 福

笔者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大学毕业后又被分配到农村，做了一名乡镇基层干部。悠悠岁月，40多载时光倏然而去。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农村干部，我切实感受到农村在党的政策指引下发生的巨大变化，也亲身见证了广大农民“财政账本”内容的变迁。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舒城县西南山区，这里山多地少，加上北濒万佛湖，交通比较落后。从我记事时起，家里最难熬的日子就是四五月份征缴税费的日子。20世纪80年代初期，家乡实行分田到户，我家从缺粮户一下子就彻底地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农民负担重的问题一直没能得到有效解

决，日益成为农村矛盾的一个突出焦点。

那时候，我在离家20公里外的高中读书，隔一段时间，我就乘坐三轮车从家里带几十斤大米到学校食堂换饭票。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从学校回家讨咸菜疙瘩。刚到家门口，就看见四五个干部模样的人从村东头走到马路上来。回到家中，听大人说，那是几个催收税费的乡、村干部。那天，我哥哥才买回来不久的自行车也被他们推走了，说是作为抵押。当时，农民手中的纳税通知书、农民负担监督卡记录着农民和国家财政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完成农业税费任务，山区的农民将春茶上市所能挣到的收入全部搭上都不够，农村税费收缴的日子是农民们最焦急的日子，也是干群关系最紧张的日子。

1994年，我被分配到乡镇工作，先是担任教育会计，两年后又被安排到农业部门任职，直接从事农民负担监管工作。那时候，正是农民负担监管比较敏感的时期。有一年，万佛湖南岸的两个村民组以茶叶税（后来改叫农业特产税）高为由，自行挖除部分茶园，并拖着挖出的茶树到乡政府大门前“下跪求情”，请求减免茶叶税。随即，县里派来了调查组，我陪同调查组成员到村里实地调查。当我们到达一个村民组的邹姓队长家门前时，邹队长迎出外，拉着县领导的手，向我们磕头，两行热泪滚滚而下，弄得我们不知所措。临出门时，县调查组负责人在我耳边问：“这是真的吧，看来这里负担怕是真重了吧？”我嗯了一声。随后，我们又村干部的带领下走访了其他农户。这件事后来在县、乡、村的共同协调下得到妥善处理。

1998年前后，这里的农民负担达到了顶峰。那时候，我们山区“两税（农业税及农业特产税）”及“三提五统”（“三提”

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五统”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人均达到100多元，反映农民负担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98年，山区一个村的三个村民组集体越级到省里上访。得到消息后，县领导带领县农民负担主管部门人员连夜赶到省城处理上访事项。我是第二天早上才得知此事的。那天早上，我刚一开门，县农民负担主管部门的一位副主任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他说，我来洗把脸，搞点热水给我。我很吃惊，问他怎么这么早就到乡下来了。那位副主任说：“你还不知道啊，昨晚你们乡里有群众到省里上访，搞了一夜，我们才回来，就直接到乡里来了。”原来，这一年，上级下达乡里的农业特产税任务比上年增加十多万元，增长了62.5%。为了保持“一次性”完成税费任务的好传统，乡里继续推行“三定”（定时、定点、定额）坐收制度，要求各村于当年4月中旬完成税费征收任务。村里将当年任务、历年尾欠（包括农电整改集资）等填写在农民负担监督卡上，告知了村民，并一并催收。由于税费任务重，加上农电整改不到位，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导致了上访事件。

我那时候是乡农民负担监管部门的负责人，接访、息访责无旁贷。于是，应村民要求，我首先接待村民查阅所在村的村级财务资料。村民推选的几个代表到乡里查阅财务资料，当看到桌子上摆放整齐的凭证和账簿时，他们把账本一扔，气愤地说：“账都做好了，还叫我们看什么看！”我只好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村账实行乡代管，不是你们上访反映问题，我们才把账做好了，我们乡1996年就在全县率先实行“村有乡管”制度，做好账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因为在“村有乡管”前，村账

普遍都是包包账、口袋账、箩筐账，平时看不到，查账时票据东一张西一张，成堆成捆。经过我的耐心解释，查账环节结束，村民对村里账务消除了疑虑。但是，村民们对没有“特产”却要交农业特产税提出了质疑。

那段时间，我们白天到村民组了解情况，召开座谈会，做解释说服工作。为了做好工作，我查阅了大量农民负担方面的政策法规，还找来了《农民日报》、《农村工作通讯》、《农民文摘》等报刊，认真研读中央的大政方针。一次座谈会上，我对村民解释道：“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将来农业税要取消，国家对农业将实行补贴政策。”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几位上了年纪的村民嘀咕着：“怎么可能呢！皇粮国税历朝历代都有，你就是瞎讲，糊弄人。”由于没有正式文件，我也不好和群众较真，只能反反复复地宣讲，反反复复地解释。那次上访事件后来虽得以平息，但是当年这几个组税费征缴任务基本没有完成，结果也不了了之了。在国家彻底取消农业税后，那些没有征收上来的税费也被一笔勾销了。接着，实行农特资源普查，对农业特产税实行据实征收。有的地方到山场数板栗、油茶、茶叶等经济作物的棵数，有的地方到山场丈量茶园、油茶园、板栗林等的面积，建立农特资源台账。但是，山区茶叶、油茶、板栗、中药材等一年究竟有多少收入，要据实征收，恐怕征收成本比收上来的税还要多。

2000年，农业税费任务与征缴和往年一样照常进行。到4月中旬，全乡大部分税费任务已经征缴完成。但是不久，国家开始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开始大幅度调减。依据农业税计税面积、农户承包的山场面积等，经过测算，全乡农民

负担普遍下降30%左右，“三提五统”变成了“两税附加”，农民负担名目减少了，负担变轻了。

为了让农民及时感受到改革带来的福音，根据上级要求，乡里决定将多收的税费立即按照改革后的标准如数退还给农民。为此，我和财政所长各带一个小组分头到村逐组逐户开展退税工作，此举让广大农民群众欢喜不已。

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减轻了，基层干部因为税费征收的工作量减少了，干群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宣布当年全国全面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自2007年起，全国不再向农民征收农业税，取消农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村内事务需要农民出钱出力的，由村民自治“一事一议”自行决定。“一步跨过两千年”，中国农民交了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现在，农民每家每户都有一本涉农存折“红本本”，记录着农业综合补贴、退耕还林补贴、公益林补贴、库区移民后期扶持补贴等，每本都清晰地记录着农民“财政账本”的新内容，一笔笔明明白白地打在农民的户头上。曾经贫瘠的山林长出茂密的森林，长成了村民的“摇钱树”，成了山外人向往的“金山银山”。舒城县大手笔决策，修建40多公里的环湖路即将竣工通车。曾经影响山区发展的万佛湖，如今已经是国家5A级景区，即将成为山区、库区人们脱贫致富的聚宝盆，“要想富，放水库”的无奈喟叹已经成为过去，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农民的“财政账本”会越来越厚实。（摘自《党史纵览》2018年第9期，原文约4000字）

【史海烟云】

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始末

张东明

改革开放初期，为加强引智工作的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领导小组是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高层议事协调机构，由邓小平提议设立，姚依林、宋平、张劲夫等都曾直接领导或从事这项工作。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成立后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为推动引进国外技术和人才、推动对外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历史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缩影。

形势与任务的迫切呼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已经铺开，一大批关键企业的技术改造和重点攻关项目正在进行，一些大型的技术引进项目正在论证或谈判，重要领域的技术政策正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规划正在编制，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也正在有步骤地展开，我国已经先后设置了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一批沿海城市和经济地带。不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改革开放都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知识的人才。这时人才不足的问题凸显出来。根据20世纪80年代初统计，我国培养了1300多万名专业人才，其中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的有683万

名，但受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们的人才队伍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相比，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在知识结构和队伍素质上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谷牧向邓小平汇报对外开放工作时也谈到沿海开放城市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人才不足。

一方面国内缺乏技术和人才，另一方面国外有现成的先进技术经验和人才，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也为此架起了桥梁，一切好像已经顺理成章，但事实并不简单。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3年邓小平发表“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重要谈话足足5年的时间里，尽管中国的大门已开，但大门内仍有无数小门，禁锢着中国的开放。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多年“左”的影响，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在思想、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着许多障碍，主要表现在：一是把引进国外人才与发挥现有人才作用对立起来，认为我国现有人才作用还未充分发挥，没必要引进国外人才。二是怕和外国人打交道，担心开展国际交流合作被视为“里通外国”，担心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三是在对外开放中热心引进资本和先进设备以及工作中的迎来送往，轻视忽视软件和人才的引进，存在把外国专家的建议束之高阁，对外国专家不敢大胆放手使用的现象。四是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涉外办事程序繁杂，层层审批，存在不少问

题。如在实际操作中，专家所需经费、外汇从何处出，如何便利专家来华入境、旅行、居住，来华工作所需携带的生活用品、小型仪器、工具怎样顺利进出海关，在与专家合作中提供什么样的资料才算泄密，等等。凡此种种，既缺经验，又无章可循。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只有几个城市可以去。有位领导同志指出：“二三十年的闭关锁国有很多想象不到的遗留症状，所以当时要开展引进国外智力的工作，必须由国家级权威来推动改革。”

重要谈话的贯彻落实

在广泛考察调研基础上，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在听取万里、姚依林、方毅、宋平等汇报后发表重要谈话（以下简称“七八”谈话）：“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过去我们是宴会多，客气多，向人家请教少，让他们帮助工作少，他们是愿意帮助我们工作的。”同时，他还指出：“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同东欧国家合作，也有文章可做，他们有一些技术比我们好，我们的一些东西他们也需要。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邓小平强调，不仅要重视资金和设备的引进，更要重视智

力、人才的引进。要从认识上有一个根本转变，态度上要积极，不能慢慢吞吞，坐而论道。必须统一规划，统一政策，有组织地进行，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邓小平提议中央成立领导小组，并请姚依林任组长，推动这项工作。

这篇谈话包含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破除了陈旧观念阻碍，科学奠定了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理论基础。这篇谈话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使引智工作开始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篇谈话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通篇体现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谈话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尖锐地指出了引进国外智力工作中存在的思想障碍和突出问题，深刻分析了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在对外开放中的战略意义，揭开了我国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新篇章。

邓小平发表有关利用国外智力的“七八”谈话后，7月10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学习邓小平谈话，并要求认真贯彻和落实。7月13日和14日，姚依林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根据谈话精神和书记处讨论意见，提出尽快以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起草文件，阐明引进国外智力的战略意义和方针政策，并责成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即后来的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制订近期引进国外人才计划。

7月底，国务院科技办与国家科委联合召开有美、日、英、法等10国科技参赞及香港新华分社科技顾问参加的座谈会。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防科工委、外交部、外贸部、中科院、外国专家局等部门派代表参加，听取各方意见。

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

发《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决定提出成立引进国外人才领导小组，并号召全党进一步认识引进国外智力的重要性，统一思想，统一政策，不失时机把这件大事抓紧抓好。

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的迅速组建

为加强引智工作的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1983年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的通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由姚依林、方毅、张劲夫、宋平组成，姚依林担任组长，张劲夫负责小组的日常工作。

在工作分工方面，9月9日即领导小组成立的第三天，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就明确了国务院各部门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分工，部署了当前的引智工作。会议要求尽快搜集国外人才资料，建立引进人才资源库，鼓励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既不要一哄而起，也不要坐而论道。会议邀请30多位知名科学家和部分高校领导列席。会后，南开大学提出拟聘美籍华人专家陈省身到该校数学研究所任所长。这也是第一个向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申报的聘请海外专家的引智项目。

在干部队伍方面，中央引进国外智力工作领导小组重视建立精干有力的引智体系和工作队伍，以便从组织上保证这项任务的顺利推进。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艾知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王维澄先后被任命为中央引智领导小组成员，以协助张劲夫工作。在领导小组下设立办公室，承担领导小组交办的任务。办公室先由赵东宛、郭树言分别任主任、副主任，

后由王迺任主任，武永兴、李明俊（兼）任副主任。同时要求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区有一名负责同志抓这项工作。按照“少而精”的原则，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逐步选调了一批有较高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理工专业毕业、有留学或国外工作背景、热心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同志作为基本骨干，充实和加强了工作队伍。后来，根据形势发展，各部委、各省市区也成立了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工作机构，并选调了一批干部，承担具体任务。许多部委、省市区领导都亲自负责此项工作。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多次批示推动上海引智工作，还担任上海市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名誉会长。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国的引智工作系统和网络很快形成，并拥有一支相对稳定的引智工作专业干部队伍，为引进智力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内部政策方面，针对开展引智工作急需解决的经费、保密、工资待遇、出入境手续、居住、旅行、海关进出境等方面的问题，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外国专家局等部门制定了《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等8个重要文件，相继于1984年底前出台，在经费保障、待遇问题、保密问题、外事问题、生活问题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为早期引智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在经费上，财政部支持建立了引智专项经费，在中央财政中正式列支，1985年这项费用达8000万元。保密方面，在严格保守国家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的核心秘密和技术专利的基础上，修改了不必要和不适当的保密规定。在工资待遇上，对应聘来的专家都坚持待遇从

优，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总的原则是使他们的净收入略高于其在国外的实际收入水平。在外事上，修改了不适当的规定和外交纪律，简化了办理签证和海关检查的手续，减免了他们携带物品的关税和在我国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在生活上，照顾外国专家和在华亲属的生活习惯，努力解决必要的居住条件，先利用现有饭店、宾馆，并积极地、有计划地建造一些国外专家公寓。这些办法的出台，使新时期引智工作有章可循，健康有序地发展。

在对外渠道方面，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想方设法、多方联系，为引进国外智力提供了各种渠道支撑。在优先重视发挥已有的官方、半官方、民间的以及各国际组织的作用，特别是驻外使领馆作用的基础上，为了便于对外联系，做好聘用国外专家及出国实习培训人员的国外管理工作，为各部门、地方服务，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1985年11月成立了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和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作为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的对外窗口。人才交流协会成立后，随即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和香港地区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办事机构，与一些外国专家组织和境外的培训机构、学校、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比如，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了美中人才国际交流基金会，在纽约以公司名义注册了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代表处。在日本、联邦德国设立协会、基金会代表处。协会和基金会以及在境外的办事机构成为引进智力的重要渠道和为各省市、各部门引进国外智力服务的重要公共平台。经过几年努力，在国外不仅有使领馆的官方渠道，也有民间渠道作为补充，形成了面向世界、多层次、多渠道、宽领域的引智工作格局，形成政府、民间机构、企业以及国内外相互结合的网络，

为以后发展打下了较好基础。

典型做法的稳步推进

从1983年邓小平发表“七八”谈话，到1988年中央引智领导小组改组为国务院引智领导小组，短短五年的时间，引智工作从起步到蓬勃发展，创造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典型做法，稳步推动引智工作不断前进。

坚持把引智工作与经济发展和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围绕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发展全局

大型工程轮胎国产化是国家12项重大技术装备中“大型露天矿成套设备”的一个子项目。大型工程轮胎是60吨矿用卡车和108吨、154吨电动矿用卡车必需的重要配件，由于国产原材料和制造工艺不过关，只能依赖每年花费巨额外汇进口。为了实现国产化，在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下，采取自己研发、合资生产、智力引进三条路子，分别在河南、天津、桂林轮胎厂攻关。经过两年多努力，取得重大突破，原胎产品性能达到国际水平，完全可以替代进口。“大型露天矿成套设备”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坚持技贸结合，运用贸易筹码，引进核心技术和培养人才

宝钢二期工程中，在引进价值5亿美元的热轧设备和价值3亿美元的连铸设备国际招标时，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中标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转让核心技术，要让中国工程技术专家参加共同设计、共同制造的全过程，而且中国专家和外国专家一样待遇，费用由设备卖方承担，结果联邦德国西马克公司接受上述条件而中标。除冶金部专家外，中方

1000多人参与了合作设计和制造。通过这项合作，中国设计、研发、制造领域的专家和有关企业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经过不懈努力和集体攻关，在宝钢第三期时，不仅设备达到先进水平，而且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

宝钢二期以贸易作为筹码，引进技术和智力，实现硬件软件相结合，实现了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是通过引进吸收、自力更生再创新的成功探索，这一做法得到广泛认同和应用。

坚持国内国外两条腿相结合，把引进智工作做到国外去

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从国外引进资金，去国外投资是反向。当时我国钢材、木材、化肥等领域长期需要进口，而国外有的厂吃不饱要关闭。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反弹琵琶，到国外投资学技术。于是到瑞典选择一个生产优质钢的中小厂搞一些投资，可以派技术、管理人员去学习，通过贸易学技术，还可以长期取得较国际价格优惠的钢材，后来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坚持高规格奖励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如何调动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的积极性，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张高规格礼遇那些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海外专家，以这种方式来激励专家继续奉献，同时吸引更多的专家参与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1984年中外专家春节招待会，邀请总理参加，营造尊重海外人才的热烈氛围。那一年的招待会参加者包括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以及中外专家共2000余人，国内外反响巨大。

此后，对贡献杰出的外国专家给予鼓励，逐渐成为对外国专家管理工作激励的

重要举措之一。随着对外国专家引进和表彰工作的重新开展，1991年由国务院授权国家外国专家局正式恢复设立“中国政府友谊奖”。1991~2014年，共有来自68个国家的1399名外国专家获此殊荣。

坚持正确导向，打破常规，赞同技术入股

1984年电子工业部计算机总局拟在深圳成立深圳开发科技公司，准备生产计算机关键部件——磁头。技术需要从外国引进，当时有三位外国专家掌握此项核心技术和国际市场，提出合作的条件是要占合资公司30%股份。由于国内对人才智力和技术资源价值认识不足，对技术入股尚无先例，因此有关部门和领导不敢表态。

此事报告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后，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表示从技术和人才引进角度考虑应该支持，技术入股国内也是适用的，完全可以实行。于是，与国外专家合资的深圳开发科技公司很快成立，该公司很快成为全球最大的计算机磁头生产供应商。这种把外国专家个人利益与企业发展直接挂钩的做法，此后得到广泛应用。

坚持自主研发与引进国外智力结合，打破封锁

对于受到外国封锁、限制的高技术领域和商业高利润的领域，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张要自力更生，立足自主开发，同时要积极争取国外智力，加速开发。自主创新是打破封锁、限制的最好手段。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三级系统是“七五”科技攻关项目。在实施时，电子工业部提出，与国外专家合作攻关。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同意后，聘请了国外专家担任项目总设计师。

该项目前后会集了国内近200名工程技术专家联合攻关。从1988年开始到

1992年完成“熊猫”系统，该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通过攻关培养了一大批集成电路的设计骨干，为我国日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在我们宣布这一成果时，国外也宣布，这方面的技术对华解禁。

坚持“请进来”（请专家来）与“派出去”（派人出国学习）相结合

1978年，邓小平就明确指示要扩大出国留学规模，到1983年每年派出约3000人，出国留学人员多为大学和研究机构派出，工商企业派出的仅占总人数的5.4%，且出国留学多为去国外大学及研究机构学习基础学科。许多人回国后，主要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工农业企业生产中亟待解决技术、管理问题，但企业中人才知识老化，需要知识更新。

针对这一情况，1984年，中央建议：在聘请外国专家来华帮助工作的同时，可考虑在“七五”期间派5万名或更多一些工商科留学生出国。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根据这一建议作出决定，除继续使用国家正常预算每年派出3000名留学人员之外，再拨出一笔专款，资助工商企业增派技术和管理干部到国外对口单位学习实用技术和管理，每年3000人。这标志着我国派遣出国学习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请进来”和“派出去”相互配合，全面体现引进国外智力的方针。

可喜可贺的显著成效

1983~1988年，在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协调下，在各部门、各地区党政领导下，引智工作很快进入快速轨道，引智项目和规模有了较大的增长，除随设备合同来华服务的经济专家和文教专家

外，使用引智专项费用聘请的技术、管理专家从1984年的300人增加到1987年的2000人，4年累计达5000人，出国培训从1985年的900人增加到1987年的2500人，5年累计派出近5000人。由于引智工作是紧密结合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的，成效显著。

农业方面，聘请国外专家帮助引进良种、栽培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在一个地区取得成功后并加以推广，促使农作物获得大面积增产。如黑龙江等省推广了由日本专家石本正一传授的地膜覆盖技术，几年之内增加经济效益30亿元以上。

工业方面，一批企业借助海外专家帮助技术改造、技术攻关，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同时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为国家出口创汇，取得可喜的经济效益。中国汽车总公司聘请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前副总裁麦克唐纳等11位高级专家担任顾问。这些顾问通过深入调查，为我国汽车工业的产品开发、技术改造、资金筹集等战略规划和体制提出一整套很有价值的建议，仅一汽改型的技术改造方案被采纳就节约了1亿多元。武汉市聘请联邦德国退休专家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对引进现代化管理、提高产品质量起到了典型示范作用，他的治厂经验受到中央领导和我国经济界的重视。在一批基本建设工程项目中，请国外专家对项目的设计、施工方案提供咨询，解决了一些关键技术问题，降低了工程造价，加快了工程进度，一批重点技术攻关项目取得重大突破。

在宏观决策、城市开放方面，按照邓小平的指示，聘请海外专家担任顾问，国务院聘请了吴庆瑞、包玉刚担任沿海开放城市顾问，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的工作受到邓小平、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充分

肯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批示中写道：“没有想到引进国外智力工作，我们几年来作出了这么大的成绩，可喜可贺，谨向同志们致敬。”党中央的热情赞扬与鼓励有力地推动了引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1988年7月，根据形势发展需要，

为了加强对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引进国外智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外国专家局，由国务院管理。由此，引进国外智力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摘自《党史博览》2018年第9期，原文约9000字）

新中国第一路跨越巴山蜀水

田 妹

自古以来，巴蜀地区陆路山高路陡，水路滩险水急，恶劣的交通状况让巴蜀人民苦不堪言。1952年7月1日，在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下修建的成渝铁路建成通车，改变了这一现状。

这条穿越大山的新中国第一路，不仅是中国人自行设计施工、完全采用国产材料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而且开启了西南地区经济交流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圆了近半个世纪的梦想

成渝铁路，联结着四川盆地两大中心城市——成都和重庆，所辖地区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素来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早在晚清时期，争夺成渝铁路的修建和经营权进而控制四川，已是国内外关注的一个热点。

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清政府，提出自修川汉铁路的意向，并于次年设立了官办的铁路总公司。而川汉铁路的西段正是成渝铁路。此后，为了筹集修路资金，公司先由官办改为官商合办，并以“租股”方式按田亩多少分摊到农民头上，

四川百姓苦不堪言。后因川汉股款不清，铁路改归商办。

1911年，正当川汉铁路紧张筹建之际，清朝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签订了借款合同，其代价之一便是出卖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并由此引发了保卫川汉铁路股权的“保路运动”。清朝政府继而疯狂镇压，血雨腥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索。

然而，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许多仁人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抗争得来的修路权，却被当时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束之高阁。几次所谓动工，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却不见半点铁路踪影。1936年，国民政府成立成渝铁路工程局，次年正式开始修筑。万万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后，因全面抗战爆发，一寸钢轨尚未铺就便停工了。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挥师入川，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刚刚解放的西南地区，由于战争的破坏，城市百业萧条，农村衰败不堪，城乡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当务之急。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重点抓什么？如何抓？考验着刚刚执掌政权的共产党人。在经过多方权衡、深思熟虑之后，以邓小平为第

一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做出了第一项重大决策：“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

为了争取中央对兴建铁路的支持，邓小平在向毛泽东汇报中列举了三个理由：一是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不修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通。二是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修建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经济复苏，并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三是中国人从未自行设计施工修建过铁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既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这三点理由从历史的眼光、现实的意义和未来的发展等角度，充分阐释了修建成渝铁路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项目。

1950年，中央很快做出了批准修建成渝铁路的决定。

众志成城筑铁路

早在解放西南之前，熟知四川民情的邓小平就在着手策划西南解放后的建设和发展。1949年6月和7月，邓小平两次拜访陈毅的堂兄、曾任国民党军联勤总部兵工署沈阳兵工厂中将厂长的陈修和，询问成渝铁路建设的情况，并邀请这位著名的兵工专家回川参加建设。邓小平指出：我们进军西南，一开始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而建设西南首先要从交通事业抓起。我们还面临着很大困难，只好集中力量办一两件事，不能百废俱兴……成渝铁路一开工，不但可以带动四川的经济建设，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1950年3月，西南铁路工程

局在重庆嘉陵新村成立。随后，西南军区各部队总共抽调了3万多名工程兵战士，组成了5个修建成渝铁路的军工筑路队。6月15日，盛大隆重的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在西南军区操场举行。邓小平亲临开工典礼，并激动地致辞说：“四川人民渴望40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随后，贺龙将印有“开路先锋”4个大字的红旗，交到了负责建设成渝铁路的西南军区工兵部队战士代表手中。

修建工程所遇到的困难，除了山高水险等自然险阻外，还有猖獗的匪患。在成渝铁路工地沿线，东起巴县、永川，西至简阳和成都郊区的龙潭寺、石板滩，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土匪武装同地主恶霸势力相勾结，大肆进行骚扰破坏。高举“开路先锋”大旗的工兵部队战士们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既是修筑铁路的主力军，也是保护工地安全的战斗队。

朝鲜战争爆发后，修筑成渝铁路的工兵部队大都参加了抗美援朝，工程指挥部又在四川各地招募了大批失业工人和农村民工。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大量民工在江边、山坡、沟壑甚至农户的羊圈和猪栏安营扎寨。有些民工的卧具仅为一张草席，有的衣衫单薄，夜里只得几个人挤在一起靠体温取暖。然而，施工的艰苦与此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缺乏机械设备的困难条件下，他们凭着铁锤、钢钎、炸药、扁担、竹筐和豪情壮志，夜以继日地劈山开路，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解决了修路中的不少难题。

为了解决修路经费短缺问题，工程技术人员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就地取材，多用价廉的石料，少用钢筋混凝土。除大中型桥梁使用钢梁外，其墩台、基础以及中小型拱桥、涵洞尽量利用沿线所产的石料，大大节约了修路的材料费

用。沿线参加修路的民工不计报酬，自带干粮，自备工具，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干活。不少人甚至将家藏的寿板、房料等无偿捐献出来作铁路枕木。正因如此，他们建成了新中国在丘陵地区最省钱的铁路。

为了克服技术难题，加快工程进度，工地上出现了一股搞发明创造的热潮，先后出现了爆破开山新法、单人冲眼法等。运输方式也由最初的人力扛抬，发展改进为木牛流马、自造小车、翻板自卸，还采用了滑板运送拱石的方法。工地没有起重机，工人自设葫芦杠杆、绞磨起重、缆绳吊车等。1951年7月，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将施工中出现的新方法、好经验汇编成册，全线推广，大大加速了成渝铁路的施工进度。

带动百业兴旺

成渝铁路开工后，所需的第一批器材分配给私营机器厂承制的就有500余吨，这使得重庆停工已久的将近30家大中型钢铁厂、机器厂又重新开工，并带动了400余家小型工厂陆续恢复生产。而铁路所需的钢轨、鱼尾板和螺丝钉等器材，全部委托西南工业部所属工厂加工生产，这样既能满足筑路的需要，也为以重庆为主的大批工业企业带来了生产任务。当时的第29兵工厂、重钢三厂等企业就承担了其中大量材料的生产任务。其中，成功轧制出新中国第一根钢轨的第29兵工厂承担了成渝铁路钢轨生产的全部任务。

经过两年艰苦奋战，1952年6月13日，西起成都东抵重庆，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全线贯通。7月1日，重庆和成都两地同时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庆祝典礼，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领导人

纷纷题词祝贺。在庆典上，邓小平挥毫写下“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

成渝铁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己修筑、全部采用国产器材的第一条铁路。这是以前任何时代都不可想象的奇迹，是中国铁路史上的一个创举。它的建成，不仅实现了巴蜀人民半个世纪的夙愿，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及驾驭、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同时，作为连接川西、川东的经济和交通的大动脉，成渝铁路的建成通车，改变了四川乃至西南交通闭塞落后的状况，为沿线富饶资源的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四川各地的农副产品如生猪、油料、白酒、药材等，丰富的矿产品资源如原煤、金属矿石、食盐等纷纷运销国内外；外省的货物也可沿此线运到四川各地，丰富了城乡人民的物质生活。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城乡交流也因此打破了地区间的封闭状态，城市和农村互为市场，进一步促进了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此外，依托成渝铁路交通干线的地区经济带和新兴城市群，如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永川、江津等也逐渐发展起来。成渝地区成了西南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成渝铁路成为西南交通网中的重要环节。

“要致富，先修路”。成渝铁路的建设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一条便捷高效的交通线路，更重要的是，它带给人们对交通与经济关系的无限思考和“经济建设交通先行”思想的重要启示。从此，四川踏平山川阻隔，以开放的眼光和胸怀融入全国经济版图，为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兴起拉开了序幕。（摘自《红岩春秋》2018年第7期，原文约4000字）

【人物春秋】

毛泽东：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胡新民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1998年12月26日，即毛泽东诞辰105周年的那一天，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况做出了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国在改革前实行的社会主义政策为其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1979年前在扩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和实行土地改革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改革后更加成功成为可能。”他说，中国在进行市场改革时，得益于受教育的人口和深入到农村地区的医疗保健制度。中国的改革后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惠于早些时候中国的改革前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人均寿命由解放前的35岁延长到了68.2岁，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新中国在改善人民健康状况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离不开毛泽东的指导，他把“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作为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根本宗旨，医疗卫生领域的许多重大举措都是毛泽东指示、部署、推动的。

“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工作。早在1933年的《长冈乡调查》一文中就强调：“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延安期间，有

人对延安卫生条件差印象不好。毛泽东说道，知识分子懂科学，懂得搞好卫生可以预防和减少疾病，我们就请他们来作宣传，带头修建厕所，开设粪场。面对陕甘宁边区一度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流行的情况，毛泽东强调：“卫生问题是边区群众生活中一个极严重的问题”，“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又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在1957年10月13日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1960年3月，针对有的地方对爱国卫生运动有所放松，毛泽东要求各地把这项运动重新发动起来，“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要“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同时，他还着重指出：“卫生工作之所以重

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20世纪60年代之后，毛泽东又亲自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运动，创造了为世界瞩目的中国式初级卫生保健模式。所有这些，都有效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的身体健康，成为新中国前三十年巨大历史性成就中一项特别突出的成绩，也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曾经评论说，毛泽东对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视，体现了毛泽东“改变中国人的体质的雄心”。1956年，一批英国医生组团访问中国。回到英国，“带回了使‘中国通’吃惊的报告，这是一个有关‘对苍蝇的成功控制、整洁的街道和家家户户非常清洁’的报告。利物浦热带医学院院长布赖恩·梅格雷思教授，把村卫生委员会的群众工作和街道卫生描述为‘对肠胃传染病的预防有着深刻的影响’”。该报告还专门详细介绍了一件大事：中国农村对血吸虫的防治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代表团认为，这件事对于任何一个了解过去中国农村肮脏的人来说，都会引起特别的关注。

血吸虫病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一种寄生虫病。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郊区十个县有九个县都流行此病，患者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有的地方人亡户绝。1950年冬，重灾区的任屯村农民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尽快治好血吸虫病。信发出不久，毛泽东派出的医疗队就到了任屯村，不分昼夜查病治病，抢救了不少病人。“以后任屯村农民代表还被请进京，参加国庆观礼，见到了敬爱的毛主席。”

1953年9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将无锡血吸虫病防治所沈瑜撰写的有关南方血吸虫

病的汇报材料附函寄呈毛泽东。当月27日，毛泽东即致信沈钧儒：“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并将汇报材料转交当时担任政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负责处理。

当时全国有上千万患者，形势严峻。防治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尽管日理万机，但毛泽东仍将如何有效防治血吸虫病作为一件大事，始终放在心上。1955年6月中旬，毛泽东到杭州调研农业问题，请来几位同志开会。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杭州郊区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工作人员回来后，把亲眼所见到的农村血吸虫患者的痛苦状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在我国的东北、西北和江南一些地方，长期以来，都有地方病危害人民的健康，情况很严重，血吸虫病对人民的危害更大，一定要帮助人民解除苦难，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与华东地区的几位负责人商讨农业发展规划。11月17日，毛泽东专门请在北京的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来杭州，报告关于防治血吸虫病情况。徐运北回忆道：“当我汇报到危害人民的几种疾病，最严重的是血吸虫病，患病人数多、流行地区广等情况时，毛主席说，有这么多病人，流行的地区又那么大，要认识到血吸虫病的严重性，我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我汇报现在病人多，治病还没有理想的药物，毛主席说，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要研究更有效的防治药物和办法。当汇报到管理粪便、管理水源、消灭钉螺等任务艰巨时，毛主席说，要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要使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毛泽东又指示徐运北立即到疫区实地调研，“在疫区，我耳闻目睹，进一步认识到血吸虫病的危害，更加体会到毛主席关于消灭血

吸虫病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从方针政策到工作方法都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使我受到的教育终生不忘。”

毛泽东对在血吸虫防治中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十分重视。1956年2月28日，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消灭钉螺用土埋不行，必须用火焚烧，以期永绝后患。毛泽东3月3日即批示：“送中央卫生部徐运北同志：原定今年三月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的会议，是否按期召开？准备情形如何？望告。开会时可邀请秉志先生参加。”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各界代表时，向流行病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苏德隆教授详细询问了有关血吸虫病的防治情况。毛泽东问：“订了个7年之内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你的意见怎么样？”苏德隆认为时间过于短促，大概要用12年时间。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说：“那么，农业发展纲要上就改为十二年吧！”毛泽东还要苏德隆好好研究黄浦江钉螺问题。苏德隆深受鼓舞，和其他科研人员进行调查，制订出一些灭螺原则，在全国血吸虫病流行地区推广，取得了良好效果。

江西省余江县曾是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主席看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下了《送瘟神》的光辉诗篇。

2018年是毛泽东诗《送瘟神》发表60周年。全国多地举行了纪念活动。我国著名疾控专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周晓农为此撰写了纪念专文。文章写道：今天，我们在纪念毛泽东主席《七律二首·送瘟神》发表60周年的时候，有必要重温毛泽东主席就这二首诗撰写的后记：“六月三十日《人

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现在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一个或者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灭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到疫情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重温这段后记，我们深感：一是当年毛泽东主席怀着对人民负责、以人民为出发点的初心，高度重视对危害人民群众严重疾病的防治，体现了共产党人始终以人民安危为根本，以减轻人民群众疾苦为己任的精神；二是毛泽东怀着依靠人民、依靠科学的胸怀，欣然命笔写下的光辉诗篇，不仅是对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热情赞颂，也是对在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各行业专家、人民群众与血吸虫病做斗争的坚韧不拔精神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讴歌。今天，我们纪念《七律二首·送瘟神》发表60周年，就是要不忘伟人的初心，不忘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继承和发扬“余江血防精神”，以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决心，坚持依法防治、科学防治、因地制宜原则，加速推进我国消除血吸虫病的进程，为实现健康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做出我们的贡献。

意义深远的“六二六指示”

尽管新中国的各项医疗卫生事业都

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毛泽东对于医疗卫生制度与工作、特别是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却一直有着诸多不满与批评。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毛泽东之所以特别关注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是与当时的两个极端的情况密切相关的。第一个情况是，原本在合作社期间开始发展的，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得到继续发展的农村合作医疗，在1962年后被当作“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产物加以抑制。这样，全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另一个情况是毛泽东对城市占用过多的医疗资源提出严厉批评。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64年8月10日，毛泽东阅卫生部党组七月二十九日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的报告。报告说，今年六月二十四日，主席在会见越南外宾时，对我国的高干保健工作提出了批评。报告检讨说：我们的高干保健工作中严重地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而且一些医生、护士长时间脱离病房工作、门诊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毛泽东还批注：“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毛泽东对当时医疗卫生状况的强烈不满，充分表现在“六二六指示”中。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医务人员谈到买来两套医书是普及性质的，但可能与中国情况特别是农村情况有不符合的地方。毛泽东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他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

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在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四清”运动到1968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把这些都告诉卫生部。

自“六二六指示”以后，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农村合作医疗得到了快速而有效的发展。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介绍了黄钰祥、王桂珍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也就是这篇文章，第一次把“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针对农村常见病，就地取材、土法

上马炮制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赤脚医生”手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成50多种文字，面向全世界发行。

有位对这段历史研究深刻的学者称：“通过吸纳中医，创设赤脚医生制度，为中国几亿分散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这是一个事实。”的确，这个事实已

经成为争议最小的社会共识。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在考察报告中，把由毛泽东倡导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医疗卫生模式，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称为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民众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的范例，并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后来据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响力的“阿拉木图宣言”。（摘自《党史博采》2018年第10期，原文约9000字）

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

刘 源

父亲刘少奇的一生，与国防、军事和军队有不解之缘，紧密相连。因为，在他成长生活的年代，这是无可回避、至关重要的；于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又是不可或缺、生命攸关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父亲逐渐将工作重心放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思想建设上。我认为，他也是有意在军队建设方面疏离了一些。抗美援朝时，毛泽东先后委托林彪、周恩来、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事务，但许多工作仍由刘少奇主持。例如，组建和装备中国的防空兵、空军、海军，是刘少奇在建国前的1949年6~8月，赴莫斯科直接向斯大林提出，并当场得到满意答复。

1954年9月下旬，中央军委不设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就没有再任中央军委职务。从1943年3月起，父亲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共11年半，并主持过军委工作。他任职期间，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革命战争胜利进程和国防建设突飞猛

进、成效最为卓著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军事和军队在世界上崭露头角、为世界所公认的最重要时期。

早在1950年，朱德总司令提出军队正规化，准备授军衔。经过长期细致酝酿，基本设计套用苏联的军衔体制，拟订的方案和名单反复上下。1955年2月8日，刘少奇委员长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按斯大林例，原拟毛泽东为大元帅。毛伯伯坚辞不受：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呀！到群众中去讲话多不方便呀！依我看哪，现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不评军衔为好。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也在部队搞过，你也应该评元帅。父亲说：不要评了，我现在不在军队工作了。毛泽东又问周恩来和邓小平：你们的元帅衔要不要啊？周伯伯说：不要评了。小平叔叔说：当什么元帅哟，早不带兵了。

之后毛泽东接见南美代表团时，讲

到自己被迫打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又说：“我们的许多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其他许多元帅、将军，起初都不会打仗，是在战争中学习起来的。”

不担任中央军委职务后，在军队的领导和管理上，父亲不具体过问。但当军队需要，比如说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干部教育、军队党建发展等，他总是认真尽力，一丝不苟，对国防建设、军事战略以及战争问题的关注从无丝毫放松，决策和工作从无怠懈。

譬如，关于“两弹一星”，是父亲向毛泽东建议，单靠部长或副总理都抓不上去，必须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管，并决定建立专门的政府机构。

我的大哥和二哥从苏联留学归来，一个到偏远艰苦的内蒙古，献身原子弹、氢弹的研究生产；一个穿上军装，投身导弹、卫星火箭的研制。早年时期，父亲为革命战争，被迫诀别爱妻，舍弃儿女；晚年时期，父亲为国防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两个爱子，了却心愿——父“卫黄”，儿“保华”！

有些更大的事务，在中共中央一直是由父亲总负责，至今鲜为人知。仅举援助越南抗法、抗美援朝之事。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联访问，父亲再次代理主席。不久，周恩来也随去莫斯科谈判。忽闻广西边防急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来访。父亲和朱德很是惊喜，下令以最高规格，“热情接待，周密护送进京”。

胡志明，越南劳动党的创始人，后成为震撼世界的伟人。越南原为法属殖民地。胡留学法国，1920年加入法共，后到苏联。1925年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到广州参加大革命。在毛泽东为主任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旁听，父亲讲授中国工人运动；

在黄埔军校旁听，认识周恩来、陈赓等。所以，胡志明一直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为老师，尽管胡志明的年龄比他们都大一些。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越南，胡志明立即派两位特使持亲笔信来北京。1949年12月28日，父亲起草中共中央致胡志明电，同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两次与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面谈，派他赴越南当中共联络代表，持刘的亲笔信出发。此时，胡志明已请长假，“赤足步行”亲来中国，在崎岖山间走了17天，见到边界上的解放军战士，高兴得又抱又亲。战士们听说这位老爹是越南主席，不敢相信，马上汇报。

1950年1月30日，隆重欢迎胡志明主席，父亲和朱德见到老战友，其情其景其兴奋可想而知。胡志明讲述了越南状况，提出援助要求。刘少奇、朱德当场对援助要求“给以满意的答复”。2月3日，送胡志明访苏，去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

自此，父亲一直总负责援助越南。他与韦国清面谈，委派其任援越军事顾问团团团长。韦国清是广西壮族人，懂些越语，认识胡志明。之后，开始对越大规模、“全方位”、“毫无保留”的援助。刘少奇给胡志明的信笺电报不下百件，包括军队怎么编，物资怎么运，根据地怎么建，边贸与援助怎么区分，群众生产生活怎么抓等，全面周到。

首先，就是要打通接壤的边界。父亲亲手修改作战方案：不仅打通广西，还加上云南。1950年5月23日，父亲电示陈赓，“望用心协助他们，使他们在老街战役中获胜……将来作战指挥及后方勤务等，陈赓同志均有亲自前去协助之必要”。7月，边界战役初定，父亲委任胡志明的

这位老熟人为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入越南帮助。9~10月打了大胜仗，消灭法军8000多人，解放5市13县。

1951年3月，陈赓奉调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组建第三兵团入朝鲜，韦国清负责军事援越指挥作战。

在听取韦国清汇报后，父亲敏锐地察觉到越南西北高原的战略地位，若占领后我将与北越连片，滇越铁路疏通，援助力度大增，兵锋指平原。1951年9月，父亲当面向秘密访华的胡志明提出“西北战役”重大战略建议。胡志明惊喜瞠目……父亲即派罗贵波兼军事顾问团工作，韦国清全力帮助越南建立正规军。

1952年，父亲指示罗贵波提请越南党：“注意解放老挝。这将在战略上有价值，目前又是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胡志明高度赞同一致，对中越双方来说，这一“西北战略”，浓缩为父亲的一句话：“帮助老挝解放，甚为重要！”

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换上了苏式装备，在朝鲜的陈赓联署彭德怀请示军委：缴获大批美军装备如何处理？刘少奇商毛泽东、周恩来后，将绝大部分赠予越军。韦国清在中越边界，抓紧整编、装备、全训越南正规军几个师。运交的美军武器，使整训部队焕然一新。

1953年冬至1954年春发动旱季进攻，越南新建的几个师正规军，全部上阵接受实战考核。韦国清也将我全套教官转为顾问团，遂行战场考核。

骄傲的法军经过“边界战役”已不敢轻敌，但说什么也想不到，全套美式装备的“土越共”如此厉害！法军一触即溃。我“西北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打乱法军部署，将其压抑在奠边府地区。我夺得主

动权。

任何战争都充满意外！仗打得挺漂亮，但还是出了我顾问团意料外的重大事件：考核下，越军过于亢奋，战事过于顺利，追击过于生猛，山林过于迷乱，一不留神、没能勒住过了梭，顺带打出个全天候兄弟国家——老挝！这就是战争，不用讲的硬道理！

1954年5月7日，刚被我训练合成步、炮、工、通、装的越南正规军，大胜于奠边府，法军16000多人被歼，俘虏将军和士兵10000多人，西方大受震动。

法国要回战俘，撤出越南和整个东南亚。越南按17度线北南分治；早一步驱逐法国殖民者，已解放的老挝王国也就独立了。这就是日内瓦会议谈判判定的。

几十年抗法、抗美，越南凭的就是绕行老挝，特别是开辟“胡志明小道”，靠的就是人民战争，如用“大战三千里，力当百万师”的“纠缠扭打战法”持久拖垮敌人；特别是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的适当结合转换”击溃歼灭敌军。1973年，几十万美军陆续撤出；1975年，越南人民军攻入西贡。

美国曾宣布，“朝鲜战争是唯一没有打胜的战争”，而“越南战争是唯一彻底失败的战争”。美国人承认，这两场战争都败给了中国人。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父亲终生不忘初心，他竭尽全力去做了，他舍生忘死做到了——了却军民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何怜白发生！（摘自《南京党史》2018年第5期，原题为《梦回万里 卫黄保华——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约10000字）

【海外反应】

浅析兰德公司的中国军情研究

陈 晴 肖 欢

得益于美国军方的大力资助，兰德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与军方关系密切，对美国军事政策制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其在《全球智库指数报告 2017》中的“防务与国家安全”专项排名中位居第三，被称为“超级军事学院”。

冷战时期，兰德公司的研究重点是苏联和中国，出现了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如曾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艾伦·惠廷、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哈罗德·欣顿等。1971年，兰德公司的报告《重新制定对华政策》主张美国采取“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的立场，被尼克松政府采纳，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扫清了障碍。冷战结束后，美国将中国视为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对手，兰德公司也开始加强对中国军情的研究。这一时期影响力较大的几份报告包括：1995年发表的《中国空军迈进 21 世纪》、1999年发表的《“台湾的国家安全”、防务政策及武器获得程序》、2000年发表的《解读中国的大战略：过去、现在与未来》、2001年发表的《中国商业技术在军事方面的潜能》、2006年发表的《中国的国防工业正在前进》、2011年发表的《与中国冲突：前景、后果和战略威慑》，上述报告均成为美国国防部制定对华战略的重要依据。

本文将以兰德公司 2012~2017 年期间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开发布的中国军情研究成果作为对象，分析其关注的内容和研究特点，从而对美国智库的中国军情研究探

寻冰山一角。

关注中国军情研究的主要内容

通过对兰德公司有关中国军情研究成果逐一梳理，可以发现兰德公司对中国军情研究深入，重点突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注重对中美军力进行比较研究

兰德公司有关中美军力比较的研究成果约占总数的 50%。研究报告中所论述的中美军力比较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

第一，按时间进行纵向比较。如“中美军事计分卡”项目选取的时间段为 1996~2017 年，对比的时间节点为：1996 年、2003 年、2010 年和 2017 年，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军队在硬件和作战技巧方面依然落后于美国，但在威慑美国空军基地、挑战美空中优势和攻击美国航母等方面取得了关键技术的进步。

第二，按地理空间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成果较为一致的结论是中国军队的远程投送能力有限，地理距离严重影响中国的战斗力。但在亚洲范围内，中国的“主场优势”可有效抵消美国的军事优势。同时，中国投送能力的不断增强致使美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不断缩小。过去 20 年，中国军队已转型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在近海区域的中美竞争中略占上风，在远海区域与美国势均力敌。

第三，按武器装备进行综合比较，美国在水下作战、空基导弹、远距离空袭和新型隐形作战武器方面仍然保持优势，这将威胁到中国的战略目标。而中国空军正在不断向现代化和高水平方向转型，此外，中国在卫星发射以及网络攻防方面的能力也不可小觑。

注重对中国军队的弱点进行研究

不同于保守派智库更注重渲染“中国威胁论”，兰德公司的研究更多聚焦于中国军队存在的弱点与不足。兰德公司在研究成果中也表明进行此类研究的目的是：对美国而言，关注并研究中国军队存在的弱点，可以预测未来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达到维护美国的利益，有针对性地提升美国及其盟友的相关能力，阻止中国使用武力或胁迫解决争端的目的。对中国而言，其目的是“让中国认清现状，不盲目使用武力，避免冲突和战争爆发”。

兰德公司研究中国军队存在的弱点时多从中国国内学者和美国学者对中国军队的认识两个角度出发，得出中国军队存在的缺点主要体现在体制和作战能力这两个方面。体制方面的弱点表现为：指挥体制过时，军队人员素质不全面、专业性弱，现代化转型不完全，七大军区的设置不符合现代联合作战的要求，国防工业处于垄断地位，且依靠的是过时的行政管理体制。在作战能力方面的缺点表现为：战略空运能力和特种作战飞机缺乏，在舰艇防空和反潜方面经验欠缺，远程投送能力有限，后勤补给不到位。兰德公司研究员认为，上述弱点严重制约了中国军队的发展，阻碍了军队现代化进程。在研究中国空军时，研究员犀利地指出中国空军发展的重大障碍依然存在，空军飞行员在战术和技能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缺陷，空军内部以及与陆军、海军的联合指挥和控制概念

不先进，同时以陆军为中心的体制依然会从深层次阻碍空军发展。针对中国军队正在进行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2017年兰德公司的报告指出中国军队改革中的一些问题仍不明确，如五位战区司令均来自陆军，以陆军为中心的领导体系仍旧存在；战区与战略支援部队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协调存在难度等。可以看出，兰德公司对中国军队整体及各个军种，历史和现状中存在的弱点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分析。

注重研究中国与除美国外的第三方国家的军事关系

兰德公司关注中国与除美国外的第三方国家的军事及安全关系。首先，关注中国与地区强国印度和俄罗斯的军事关系。《双重问题：用现实主义观点审视崛起的中印大国》一文称，安全问题和边境问题是中印冲突的触点，印度将会持续向美国寻求政治军事支持。但是，中印两个崛起的巨人更倾向于给美国带来复合性挑战，加剧亚太地区军事竞争。关于中俄关系，研究员斯科特·沃伦·哈罗德认为，中俄之间密切的军火贸易对美国的战略和政策目标构成威胁，《俄中同盟正在酝酿中？》一文就探究了中俄军火贸易背后的动因。

其次，关注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如研究员乔纳·布兰克认为中国和巴基斯坦军事关系发展面临的阻碍有：中国历史上对于结盟理念的排斥；中巴之间的文化差距；中国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敌视；以及中巴对于彼此的安全需要已经度过“蜜月期”等。再如，《中国受到来自朝鲜的挑战》一文探究了中国的对朝军事政策，称中国竭力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朝鲜的不稳定直接威胁到中国的稳定，因为朝鲜一旦崩溃，成千上万的难民可能会涌入中国东北。此外朝鲜对中国也持排斥态度。

最后，关注中国同美国的敌对国家之

间的关系。如《审视中国和伊朗的关系》一文就探究了中国和伊朗的关系。文章称中国和伊朗的伙伴关系会挑战美国的利益，中伊关系建立在中国能源需求旺盛、伊朗石油资源丰富、非能源经济联系、武器交易、国防合作和应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合作等基础之上，中国对伊朗的政策已经伤害到了美国及国际社会阻止伊朗发展核能力的努力。美国从根本上改变中伊关系的能力有限，但应继续向中国施压，减少其与伊朗的联系，阻止伊朗发展核能力。

中国军情研究的特点

通过统计和分析兰德公司2012~2017年间发表的有关中国军情的120份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该智库中国军情研究呈现以下若干特点。

基础研究和热点问题分析并重

兰德公司非常注重基础研究，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中国军事发展长期性、根本性问题的研究上。研究成果中，对中国军力现状、中国军队现代化及改革、中美军力对比、中国军队弱点等问题的研究占比过半。从宏观方面开展对中国军情的研究，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对中国军队的优劣势形成全面清晰的了解。在政策制定、外交活动、应急处突等多重情况下，扎实的基础研究也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信息，以分清形势，做出判断。

同时，对于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兰德公司也能快速反应，擅长分析时事背后的动因。如2013年初，中国宣布提高国防开支，兰德公司立即开展研究，学者斯科特·沃伦·哈罗德在分析中称：提高国防开支是中国政治力量过渡时期领导力的体现，中国准备谋求地区主导力，并修正

军队中存在的痼疾。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兰德公司迅速反应，相继发布两份研究报告。一份从中国邻国的角度表明新的防空识别区是对苏岩礁主权的挑战，并覆盖了部分日本的防空识别区，继而强调美国政府应鼓励日韩就海洋地理数据进行科学合作交流，以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压力；一份从历史的角度阐明，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争议领土的利益不可调和，中美应加强沟通和交流，避免因误判而引发错误的战争。

在进行基础研究和热点分析的同时，兰德公司还注重及时向美国政府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如2012年9月25日，中国第一艘航母正式交接入列，兰德公司研究员詹姆斯·多宾斯等人很快就提出应对中国军事投送能力增强而应采取的措施：保护军事信息系统，加强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建设混凝土飞机掩体，提高跑道快速修复能力，加强军事机场多样化建设。在国防预算收紧的背景下，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提高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防御能力、反潜战能力、扫雷能力和远程防空能力等方面。再如，2015年9月3日，中国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针对此次阅兵，兰德公司当天就全面介绍了中国的新型战略能力、核力量、常规武器及网络部队。同时提出应对策略：维持美国的战略威慑能力；与中国建立互谅机制，寻求更全面的中美对话机制；在多领域扩大美国的威慑范围，包括核武器、常规武器、太空和网络安全领域等；确保美国在危机中能够给予盟友支持。兰德公司绝大部分报告的最后一部分都是具体建议，这些细致、有创造性、步骤清晰明确的建议往往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便于直接转化为具体政策，提高了兰德公司研究成果的采用率。

突出对军事问题的前瞻性预测

兰德公司以分析和预测闻名，其系统分析和预算程序术语成为美国国防部的通用语，其“头脑风暴”预测法近年来在美国军事预测中被广泛应用。美国国防部在制定长远规划时，会邀请多名兰德公司的专家参加为期数周的讨论会议，最后获得一份具有较高一致性的报告，而这份报告就可能决定未来几年美国军队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兰德公司关于中国军事预测最多的是中美是否会发生战争。研究员詹姆斯·多宾斯对未来30年中美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进行了预测，他认为即使中国成为与美国匹敌的竞争对手，中美之间也不可能爆发战争。一旦发生，其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将是史无前例的。研究员大卫·冈伯特做出预测：中国视美国的航母为东亚海域的威胁，美国海军亦制定“空海一体战”战略，在美国航母被攻击前首先摧毁中国的战斗力，这种互相不信任会导致中美冲突升级，增加中国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的可能性。哈罗德·布朗也对中美未来的竞争做出预判：未来15~20年，美国在综合国力和军力上依旧保持优势，但中国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如针对美国电子、卫星系统及基础设施进行网络攻击等行动会削弱美国的优势。

此外，兰德公司也会预测中国面临突发事件的反应。如2015年10月27日，美“拉森”号驱逐舰进入南海海域后，研究员蒂莫西·希思预判中国的反应不会是完全置之不理，也不会是军事打击，而是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即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建设，在黄岩岛部署驱逐舰，派出舰艇“阻扰”美国军舰，此次冲突是否升级完全取决于中国的反应。

最后，预测内容还包括中国各军兵

种未来的发展趋势。如研究员罗杰·克里夫利用公开资源分析中国空军未来的兵力运用概念，预测这一概念所隐含的意图及未来中国空军如何在台海冲突中运用此概念，并针对可能发生的情况提出美国政府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

研究态度和方法相对客观和中立

相比美国保守派智库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激进判断，兰德公司的研究力图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客观和中立。

一是研究态度方面。兰德公司对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较为冷静，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对两国来说都是致命的，不应牺牲与中国的合作来应对中国的崛起。鼓励中美领导人从以往的战略失误中汲取经验，寻找渠道化解危机，避免军事误判。研究员特雷斯·凯利称，中国并不是21世纪的苏联，中美两国存在许多共同利益，应合作共赢，美国应承认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以及其合法的利益，从而推动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合作发展。

二是研究方法方面。兰德公司下设六大研究方法中心，依靠每个中心特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为决策过程提供支持，包括应用网络分析与系统科学中心、质性和混合研究方法中心、博弈研究中心、因果推断中心、不确定型决策中心、可扩展计算与分析中心，每个方法中心所采用的研究工具也不尽相同。研究员在开展军事领域项目研究时会应用以上研究中心的研究工具，尤其是兰德公司独创的运筹分析理念、系统分析方法、假设分析法、特尔斐预测法，通过计算、分析和列举等对对象国军事情况进行解释说明并开展预测。例如，“中美军事计分卡互动观察”项目由14位学者参与，包括兵棋推演专家大卫·什拉帕克、模型与模拟专

家杰夫·哈根及作战行动专家迈克尔·尼克松。他们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了博弈研究法，使用了博弈、模拟和建模等研究工具，模拟设置了两个不同的战场想定：解放台湾和南海冲突，将战场中具体问题的所有细节都拆分量化（运用系统分析法），用10张记分卡对应中美两国在特定实战条件下的战斗力，其中第1~4张卡主要描述空中作战能力，第5~6张卡用来描述海域作战能力，第7~10张卡展现的则是太空、网络空间和核力量方面的能力。该项目从战争的每一个方面及战争全貌系统分析中美军事对抗中的强弱对比变化（运用运筹分析理念），严密的逻辑思维与科学的研究方法增强了结论的说服力。

但是，兰德公司的军方背景决定了它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客观中立，在其最终提出的具体举措中多是对中国军事发展的全方位防范。如迈克尔·查塞在报告中针对南海问题提出，中国在南海争议地区的“建岛”规模和速度已经远超其竞争对手，永暑礁建设飞机场和岛礁“军事化”，并不只是在宣示主权，更重要的是增强对南海的军事投送能力、空中补给能力和威慑邻国的能力，值得美国注意。此外，研究员蒂莫西·希思也称中国最新公布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标志着中国崛起进入了强制推行阶段。中国秉持综合安全观，意味着“只要是阻碍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事物”，都可能被视为“安全威胁”，继而中国可以采取合法的军事介入手段，“为捍卫自己的利益不惜冒险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对抗”。为应对中国崛起，研究员斯科特·沃伦·哈罗德提出应将中国放入亚太环境中考虑，以期通过影响中国的邻国和伙伴关系国家达到美国的战略目标。

研究成果致力于影响最终决策

兰德公司作为美国的重要智库，最根

本的任务就是影响决策者的最终决策。兰德公司在政府官员做出决策及行动之前就及时提供详细的背景资料以及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以最大程度影响最终决策。2012年9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部长莱昂·帕内塔访华前，兰德公司发表研究报告，建议帕内塔此次访华所需完成的任务，包括说服中国领导人结束与日本关于东海争议岛屿日趋紧张的关系。报告认为，中国国内出现了民众破坏与日本相关资产的现象，这将损害中日关系，美国应帮助中国认识到钓鱼岛争端不应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外交和对话方式解决。2015年中美领导人峰会前夕，兰德公司也曾向奥巴马总统提出了此次会面中可讨论的议题，包括网络安全和南海问题、气候变化和经济合作，并预测南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议题可能无法推进。研究员卡罗琳·米尔恩则呼吁奥巴马总统应将战略核武器政策同网络安全一样列入中美峰会的议程，后来中美峰会在共同防范和打击核材料及其他放射性物质非法贩运方面确实取得了重要进展。

虽然不能确定决策者是否完全采纳了兰德公司的建议而做出决策，但至少可以认为，兰德公司研究成果的观点和政策建议是与美国官方政策相吻合的，并在某种程度上配合了决策者做出决策。除了本身研究成果的高质量外，这也与兰德公司和美国官方之间长期密切的关系分不开，可以说是得益于“旋转门”机制在兰德公司、军方及政府部门之间的通畅运作。如康多莉扎·赖斯曾是帕地兰德研究生院最杰出的学生，后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并被邀请加入兰德理事会；美国军事变革理论的创始人兰德公司分析员安德鲁·马歇尔一直担任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一职。目前，兰德研究生院代表着决策分析

方面的最高水平，其学员毕业后，绝大部分进入美国政界和金融界等高端领域就职。此外，兰德公司的研究员们频繁应邀参与政府和军方的重要讨论，接受高官的个别垂询，有时甚至一日三次与白宫、五角大楼通话。同决策部门及决策者保持较多直接或间接联系，有利于兰德公司的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决策者，从而大大增强研究成果落实为行动的可能性。

结 论

经过对2012~2017年期间兰德公司对中国军情研究的统计及其内容和特点的分析，可以做出以下判断：兰德公司是具有一定独立性、但军方军工背景深厚的综合性战略智库，它擅长运用多种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开展对军事领域的研究。关于中国军情，兰德公司侧重于关注中美军力对比，中国军队的缺点以及中国与除美国外的第三方国家的关系。在内容上，兰德公司的基础研究与热点问题分析并重。在倾向上，兰德公司以理性态度及科学方法保持相对客观中立，但对军事发展的防范态度明显。在时效上，兰德公司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测性。在功能上，兰德公司注重发挥为领导者服务从而影响其决策的功能。

相比之下，根据《全球智库指数报告2017》统计，在“防务与国家安全”专项排名前50名的智库中，中国仅有两家智库上榜，这表明目前中国还缺少如兰德公司这样相对独立、非营利性、不代表任何派别、非军方直属的防务智库。通过分析兰德公司的运行机制及其中国军情研究成果，至少有四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这里的

“独立性”并不是指“毫无联系”。兰德公司因接受军方资助，承担政府和军队的各类课题研究，肯定不是完全独立的。“独立性”强调的是思维方式的独立性。兰德公司通过在管理执行层设置“矩阵式管理架构”，将“行政事务”和“研究工作”有效区分，确保研究人员思想的独立性。当然，这种独立性有时会导致兰德公司的研究成果与政府观点相左，甚至带来不被客户采纳的后果。但独立的思维方式能确保其研究结论的相对客观，防止出现因揣摩决策层意图而“制造”结论的现象，从而进一步体现智库存在的真正意义，保证智库实现长远发展。

其次，保持核心竞争力。智库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研究主线和研究方法上。兰德公司的研究主线特色鲜明，数十年来专攻军事尖端技术和大国军事战略走向，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预测性，能够成为决策者的重要参考，并以此闻名于世。同时，它还独创出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特别是高度重视“大数据”的搜集使用，如依靠海量的战争数据、兵力数据、装备数据支撑其所创建的决策模型和战争模型，并推测出数种可能发生的战争模式和结果。可见，鲜明的研究主线和创新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成为“强者”的根本前提。

再次，保持高效的市场营销。兰德公司的目标受众是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公众，保持高效的市场营销，才能将舆论影响力最大化。兰德公司采取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主要依靠灵活的“旋转门”机制，促成兰德公司与政府和军方形成紧密的个人关系网，以便直接影响决策者；组织传播主要是兰德公司就热点和军事外交等问题举办大型公开会议，邀请专家参加小组研讨

会以及举办各种短期培训项目，为社会公众、决策者和专业人士构建一个意见交流的平台，同时也为决策者提供一个接受教育的基地；大众传播主要是指兰德公司通过纸质、电子和网络媒体三种渠道设置政治议程，塑造公共舆论，进而影响决策者，最终影响政策制定。三种传播方式同时运用，互为补充和促进，大大增强了兰德公司研究成果的影响力。

最后，保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除了政府和军方规定的课题外，兰德公司每年会将一部分预算经费用于研究

员一致认为有意义或将造成重大影响的自主选择课题的研究上，从而很好地保持研究课题的全面性，可以基本实现将基础研究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将分析与预测相结合。例如，兰德公司非常注重对中国军事力量展开基础性研究，同时针对南海争端、网络安全等热点问题也能快速反应追踪。这种虚实结合、长短相补的运作方式，较好地解决了智库长远发展与现实生存的矛盾。（摘自《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5期，原文约15000字）

美国联盟战略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仇 华 飞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不断强化其在亚太地区既有的联盟体系，加强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和军事部署，对中国的周边安全构成了巨大挑战。美国国内智库纷纷发表对策建议和研究报告，传统基金会的研究报告《21世纪的亚洲联盟》提出“亚洲将是21世纪的地缘政治中心”的观点。这份报告认为，“由于受到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的制约，中美两国在安全方面的新的对抗关系将会影响该地区的未来。美国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地缘政治转变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目标，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共已经把自己的合法地位与维护中国的“完整性”和扭转“百年国耻”联系在一起。美国学者宣称，从军事上讲，这意味着要挫败大陆内部的或者来自台湾的“分离主义”威胁。有些美国学者从三个维度分析人民解放军对中国的海上

边界，尤其是东海、黄海和南海的控制力度：首先，中国坚信，一个大国需要对意欲在其近海进行活动的任何国家行使否决权。其次，中国想发挥影响力，以便按照自己的条件解决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由来已久的领土或主权争端。第三，中国想把力量投射到其大量海上贸易所途经的遥远的海洋。他们认为，这些目标是可以理解的，即所有崛起大国都有这方面的野心，没有任何国家以为中国的轨迹会有所不同。卜大年等承认，中美之间在安全方面的竞争并不预示着一场新的冷战将要爆发。在大国竞争中，贸易和经济融合水平的提高将会与军事对抗的加剧不和谐地共存。他们认为，合作与竞争的这种混合使得美国承担保障和威慑的任务要比冷战期间困难得多。为了维护亚洲的秩序，美军必须阻止冲突，让盟国感到放心并为其提供保护，在必要的时候主宰和控制全球公

共领域，以投射军事力量。美国必须一方面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与中国“保持接触”，华盛顿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把中国的各个利益攸关方融入自由的秩序之中。

在有些中国问题专家看来，虽然美国需要盟国以便确定更强有力的军事姿态来抗衡中国，但是它并不想造成使其精力衰弱的竞争或者核武器方面的军事竞争。由于美国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同时让该地区各国受益，所以它能够抗衡中国的力量，而又不显得具有太大的对抗性。因此，盟国和伙伴国将会有强烈的愿望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抗衡中国的实力，如果它们认为美国的政策有希望使中国“和平崛起”的话。这种混合战略带有内在的风险。美国的决策者必须小心谨慎，以免使保持接触的政策沦为妥协或者绥靖政策。

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称，导致美国亚太战略更趋复杂的原因是中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及其他地区扮演着不断强大且捉摸不定的战略角色。美国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和重新构建其在亚洲的联盟体系。冷战期间，为了冷战的目的而建立的联盟体系不利于实现当前和今后的目标。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历届政府为了适应亚洲新的现实而对美国的战略做出的调整仅仅是微乎其微的。在迅速变化的亚太地区，美国战略的有限改变就等于失败。这种失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不意味着目前的战略是可持续的。

有美国学者建议，冷战时代维护亚洲安全的“辐射状”模式必须改变。他们认为，美国的优先地位基于华盛顿能够继续主宰全球公共领域。这种需要使所有其他军事任务，从人道主义救援到地区威慑和打赢战争等责任都能完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

项目主任巴里·波森认为，中国军队正在制造“有争议的地区”，以便阻止美军进入。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还对美国在空间和电脑网络公共领域中的“主导战略”构成了挑战，这将危及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地位。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中国的“有争议地区”的地理位置涵盖了美国的许多盟国和伙伴国以及重要的海上航道。这些“有争议地区”将会为中国构成盾牌，以抵御美国的力量，并使中国能够胁迫地区内的任何国家。这里所谓的“有争议地区”在历史上都是中国固有领土或领海，即使如此，中国也希望同有关国家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议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学者的观点存在明显的偏见。

有美国学者强调，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美国必须进一步增强实力，以便重新获得对全球公共领域的主导权，在有争议的地区活动。首先，美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盟国的帮助，以获得共同的利益。他们认为，由于美军在爆发冲突的时候攻入有争议的地区要花费时间，所以盟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发本国有争议的地区，以阻止中国军队进入。其次，盟国必须提供支援能力，以帮助美国将其压倒一切的实力投射到中国军队可能会争夺的地区。最后，所有盟国都必须彼此提供更多的支援，它们尤其需要“点对点”的安排来取代“辐射状”安排。

美国安全利益下的联盟体系战略

“辐射状”模式主要建立在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双边联盟体系基础上。除了澳大利亚，各盟国都做出了基本相同的妥协：它们为美军提供基地和港口，为支援美国驻军做出相

应的贡献。一些盟国还提供军力以支援美国的战争，譬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早些时候在越南。作为回报，美国提供威慑和防御力量。这一模式曾经是灵验的。卜大年等人认为，美国与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关系具有比较单方面的性质：台湾主要关心的是获取美国的武器和“服务”；雅加达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变化多端，因而没有确立任何真正的合作模式。虽然“辐射状”模式按照有意的安排具有模糊性，从而使美国（“中心”）和盟国（“外围”）在做出反应方面获得了灵活性，但是中国的军事崛起所构成的挑战使得明确性变得更加重要。美国学者承认，“辐射状”体系设计出来时，两个方面原因证明其具有合理性。一是该地区方兴未艾的各国担心日本会卷土重来，也担心台湾和韩国获得发动战争的灵活性。二是华盛顿与其所有盟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很大，因此亚洲各国领导人基本上满足于任凭美国来选择何时及如何应对侵略。华盛顿并没有像它在欧洲所做的那样推进集体安全。然而现在，联盟需要结成一个集体网络。这个网络要能使各个联盟迅速和有效地单独或者联合行动，无论有没有美国的参加。

如何克服这些障碍，卜大年等人指出，一项共同的战略构想将会强有力地保卫共同的战略目标。美国的盟国和新的合作伙伴都具有共同的消极与积极的两方面目标。所有国家都希望得益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没有任何国家希望中国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越南、新加坡和泰国等国都希望各国遵守国际秩序的规则，保证国际航行自由，和平解决领土争端，以及对全球公共领域的自由与合法的使用。有美国学者称，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想要享有自己来之不易的独立、日

益增强的经济繁荣以及不断增加的自由。只有一项共同的联盟对策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在最为宏大的层次上，共同的联盟目标应当是说服任何企图侵略的国家，使之认识到，如果把一个盟国列为打击目标，就意味着引起其余国家的愤怒。这一方针会增强地区稳定，巩固盟国持续不断的政治和经济努力，以创建一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控制的地区。这些主张无疑是为美国维护亚洲联盟体系、插手亚洲事务制造理论依据。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加强联盟的凝聚力主要是针对中国。一些美国智库专家强调日本对美国的重要性，认为没有日本的支持，保卫韩国或者台湾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在没有新加坡、印度、越南、印尼和澳大利亚帮助（或者是默许）的情况下，确保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道的安全也会很困难。他们认为，美国在没有盟国帮助的情况下再也无法扮演传统的安抚角色，华盛顿不能期望在整个太平洋或者亚洲的海域享有行动自由。此外，美国还需要盟国在对冲突起威慑作用，以及一旦威慑失败就及时地通过战斗解决问题方面提供更多的帮助。从中可以清楚看出，美国实际上将中国台湾视为其实施亚洲联盟战略的重要棋子。

美国智库提出的所谓“联盟凝聚力的五项原则”主要体现在：第一，“辐射状”模式需要让位于一个“点对点”（即网络式）的联盟，以及特殊的联盟伙伴关系模式。所有盟国都应当具有单独自卫的手段，通过获得更大的韧性和创建“有争议区域”，在较短时间内或者共同在比较漫长的时间里这样做。第二，盟国应当能够帮助美国确保进入全球公共领域及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航道的机会，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对其加以控制。第三，盟国应当

能够为美国的力量投射提供便利。第四，美国政府必须改变其在自己建造什么武器系统，以及向盟国转让什么技术的问题上的思维定式。任何敌手都能够从若干来源之一获得自己需要获得的几乎任何一项技术。因此，美国政府内部想要拒绝向一个盟国提供所需技术的人们就必须承担提供证据的负担。最后，由于几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是潜在的敌国，所以盟国需要制定种种选择方案，以便对侵略做出常规反应，以避免核升级。这五项原则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成了巨大压力和挑战。

美国视台湾为遏制中国 崛起的“棋子”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台湾作为遏制中国崛起的“棋子”。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称“台湾将是中国大陆最有可能挑起一场冲突的地方”。他们认为，在和平时期，台湾似乎是美国的一项任性的甚至是不合时宜的担忧：过去百年历史的遗产。但如果台湾遭到袭击，情况就会显得截然不同。此外，中国大陆针对台湾的和平时期的胁迫性军事战略可能会适用于其他盟国与伙伴国。卜大年等人称，美国的盟国早就应该继续讨论中国大陆如果进攻台湾会对稳定起多大的破坏作用，怎样才能最好地对其加以预防，假如台湾落入中国大陆之手，亚洲就会被一分为二，美国对太平洋的控制就会进一步受到损害，南中国海就会变成中国的一个内湖，日本就会失去战略纵深。针对中国在海南岛部署正常的防卫设施，美国智库研究报告称，如果美国（在东亚地区）只有少数基地和港口，安置导弹及部署情报、监视、侦察部队不足，就可能让中国获得对南中国海的控制

权。这些观点不仅危言耸听，而且事实上为美国插手中国内政、侵犯中国南海主权提供了决策依据。

美日同盟：中国周边安全的 巨大挑战

美日同盟是冷战的产物，是美国试图持久主导亚太秩序、阻挠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抓手。有关美日同盟应如何应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挑战，美国智库及研究机构发表了不少文章和报告。新美国安全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帕特里克·克罗宁、保罗·吉阿拉等人的研究报告——《中国所构成的挑战：摆在美日同盟面前的军事、经济与能源选择》为美国遏制中国和平崛起寻找理由。克罗宁等人指出，要想使美日同盟保持其在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石”的作用，美日必须解决涉及防务、经济竞争力和能源安全的棘手问题。而中国崛起与每个问题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安全方面，美日在如何应对中国军事现代化、驻日美军的可持续性，以及两国实施当前防务计划的能力等问题上可能会发生分歧。美日需要建立机制，促进有效决策，实现新技术整合。在经济方面，美日在如何实现和维持经济增长率、与新兴国家保持接触和建立统一地区贸易制度问题上的分歧，可能会削弱美日同盟塑造本地区未来的能力。两国都需要实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和基本的财政改革，采取协调一致的对策使中国融入全球和本地区开放的经济秩序之中，并做出重大努力促进双边自由贸易和本地区的包容性贸易制度的构建。两国还应制定协调一致的能源战略，在全球能源市场上确保充足、稳定的能源供应。克罗宁等人认为，美日应保持强大

联盟，维护和适应一个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系統，同时提供激励机制，促使中国等崛起中的大国成为该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奥巴马政府期间，一些美国智库专家主张美日之间应启动一项新的、高级别的战略对话，以重新评估联盟的目的、方法和手段，从联盟的基本目标开始，并制定一项明确的计划，以确保美日战略对话取得成效。他们认为，美日同盟从现在到2025年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维持联盟不可或缺的影响力，以帮助美日在未来十年建立一个更强大的联盟。美日智库专家围绕由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跨国实力构成的“三维力量”的概念框架展开讨论，力图形成战略思想和对策的多样性。

帕特里克·克罗宁等人认为，在冷战时期，中国为反对苏联侵略而实现军事现代化的目的，为美日同盟提供了黏合剂。然而，中国今天已成为美日同盟的焦点。虽然中国并不是一个敌国，但若论对这个联盟的强大潜在军事挑战，则非它莫属。崛起的中国若实现和平融入，则对美日两国都很有利。但美日两国也都承担着一种责任，就是防范潜在的中国“威胁”。中国不应是美日同盟的唯一黏合剂，但在今后几十年里，如果不理解联盟在中国问题上的目标，就会削弱美日两国间的纽带。中国的崛起在政治上给美国和日本带来了如何塑造一个崛起的中国的问题。在军事上，它提出了如何克服新兴的反介入和区域封锁能力的问题。美国智库研究报告认为，虽然美国能够保留目前的军事优势，但美日两国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是，要确定在财政和政治上存在严重制约的情况下，如何维持这一优势。美国军方通过开发实力（如网络战）、概念（如空海一

体战）、理论（如联合作战进入概念）和战略（如恢复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平衡），正在对全球技术和作战方面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挑战做出反应。即使这些举措卓有成效，联盟对维护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也将是必要的。

日本为了应对中国崛起，颁布了新的国家防卫计划指南，抛弃了其长期秉持的“静态防御”原则，转而采取“动态防御”。后者强调防御西南琉球群岛，更积极地利用军队和更大的力量机动能力。但是，像美国一样，日本的安全举措受到财政上的压力，以及美国未来决策的不确定性的阻碍。美国智库学者研究认为，日本不大可能在使用进攻性力量和集体自卫问题上明确地修改其宪法（除非一场危机迫使它这样做，届时制定对策来适应情况可能为时已晚）。尽管美国的亚洲联盟战略，尤其是美日同盟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了巨大挑战，但美国的联盟战略本身也存在严重缺陷。美国朝鲜半岛问题专家罗伯特·凯利指出：“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体系存在四大弊端：驻韩美军可能造成朝鲜半岛的永久性分裂；美国对驻韩和驻日美军的双重保证使日韩冲突陷入僵局；‘重返亚太’可能引发本想避免的中美冷战；第四，美国联盟体系让亚洲和北约坐收渔翁之利，从而不必要地增加了美国纳税人的国防开支。”就中日关系而言，虽然两国政治关系紧张，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会使中日具有足够影响双方军事冲突的能力。中日建交四十多年来，两国在经贸、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很大发展，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占据中心地位，对中日政治关系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摘自《美国研究》2018年第5期，原题为《美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圆圈的新视角》，约15000字）

【报刊荟萃】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历史人物的
策略、动因及危害

熊燕华

当前，西方敌对势力把虚无历史人物视为新形势下实施“和平演变”的重要战略手段，堪称是深入我国的“第五纵队”。历史虚无主义打着“进行学术研究”、“还原历史真相”、“重新评价历史”等旗号，把虚无历史人物作为其重要策略。历史虚无主义以唯心史观为理论基础，以形而上学为思维方法，从抽象人性论等层面集中虚无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党的领袖和革命英雄人物。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虚无历史人物，主要与历史虚无主义者自身的政治目的、国际与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历史人物身上承载的象征性意义有着密切联系。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历史人物给社会造成恶劣的危害，包括歪曲、颠覆人民共有的历史记忆与正确认知，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力，动摇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因此，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历史人物的本质，不要被它的假象所迷惑，对其要保持高度警惕之心，不能错把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历史人物当作是饭后闲来无事的谈资与娱乐。同时，我们要认识到同历史虚无主义做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只要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历史虚无主义就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并且会随着时代变化，变着花样对我国历史人物进行虚无。（摘自《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9期，原文约10000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的伟大实践

钟瑛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及开始筹备新政协，奠定了我国新型政党关系的基础，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伟大实践。7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五一口号”的真谛，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坚持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成功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实行，为协商民主的有效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民主形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从“协商民主”理论的最早阐释到“新型政党制度”最新论断的提出，7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日益丰富完善。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覆盖范围，从中央辐射延伸至地方、基层社区，我国各级党政机关、政协组织、基层组织和社会领域在积极推进协商民主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全社会的协商民主意识与自觉正逐步养成，人们普遍意识到，协商民主这种根植于中国土壤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优势：一是集思广益的优势；二是党派真诚合作的优势；三是达成广泛共识的优势；四是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伟大实践已然证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有利于画好最大同心圆，汇聚全社会广泛正能量，是扎根于中国土壤、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丰富、发展和贡献。（摘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8期，原文约8000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发展
进程的三次跨越

姜明安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法治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跨越。第一次跨越：从“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法治到逐步恢复法制。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变，从长期沿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经济建设上来。与之相适应，治国理政的方式也开始转变，从轻视法制、否定法治，长期以政治运动治国转变为重视法制，通过逐步完善民主法制，以政策和法制共同治理国家。第二次跨越：从重视依法办事，加强法制到推进法治，建设法治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国家管理初步完成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不断发动和推进政治运动为基本方式到健全民主法制，以法制作治国理

政辅助方式的转变。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法治”正式入宪。第三次跨越:从确定法治为治国方略到全面依法治国。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自此,中国法治发展进入第三阶段:全面依法治国的阶段。中共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习近平在十八大闭幕后不久举行的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样,中国法治建设第二阶段确定的以法治为治国基本方略就发展到新时代以法治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实现了法治从战略目标到全面推进、全面实施转变,这是中国推进依法治国的第三次新的伟大飞跃和进步。(摘自《法制日报》2018年9月12日,原题为《三次跨越: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法治发展的进程》,约6000字)

从财政包干到分税制: 发挥两个积极性

吕冰洋 台航

从1980年到1993年,我国财政管理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简称“分灶吃饭”,它包含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两个方面的范围划分,但以财政收入的责任划分为主,就是说,财政包干制是分灶吃饭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此期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地方与中央签订财政上的“承包”协议为主,形成了以划分收支为基础的分级包干和自求平衡的财政关系。财政包干制主要经历了1980~1984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1985~1987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体制、1987~1993年实行“多种形式包干制”三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大力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增长。财政包干制正是为实现这一主要政策目标而设计的,从效果上看,它充分调动了地方和

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增强了体制内各经济主体的激励。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财政包干制并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不得不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在此背景下,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税体制,同时提高“两个比重”,我国启动了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范围、分设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建立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制度。分税制在提高中央政府财力的同时,也改变了地方政府原有的行为模式。一方面,通过增强中央财力而显著调动了中央政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仍具有较高的积极性发展经济,并通过辖区间的经济竞争来推动经济增长等,但是对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不足。(摘自《财贸经济》2018年第10期,原文约12000字)

改革开放40年财政政策 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范金 伍琳瑜 严斌剑

改革开放40年来,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0年的财政政策分为六个阶段:1979~1984年,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1985~1998年,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1998~2004年,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5~2008年,采取了稳健的中性财政政策;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至2011年,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又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从2012年以来,财政支出年增长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这样的阶段与经济周期比较接近,在经济衰退期,采取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而在经济繁荣期或过热期,则采取的是稳健或紧缩财政政策。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均居民消费呈增长趋势,其间的增长率也出现较大波动。一是人均居民消费增长率在改革开放40年的中间时期波动大于前后两个阶段,1983~2001年人均居民消费增长率出现很大幅度的波动,而1978~1982年、2002~2017年的波动则较小。同时,2003~2007

年的人均居民消费增长率出现稳步上升,2008年开始略有下降。结合宏观经济周期境况发现,经济衰退期中的人均居民消费增长率增幅很大:1989~1992年人均居民消费增长率从1989年的-0.002提高到1992年的0.133;而1997~2000年的人均居民消费增长率从1997年的0.045增长到2000年的0.086。这一现象与积极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有效是一致的。(摘自《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原文约12000字)

中国与多边贸易体制关系的演变

屠新泉 姜承蓉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相辅相成。WTO 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引与倒逼作用影响中国,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渐进完善,贸易自由化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在改革开放效应释放的过程中渐进影响 WTO。在 WTO 体制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因处于不同的改革开放阶段经历了一系列的角色演变。2001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加入极大改变了 WTO 的成员结构,这也是 WTO 发展史上的重大标志性事件。2002~2005年,在过渡期中作为 WTO 的主动适应者,逐渐形成 WTO 的集体身份认同,但创造性贡献较少。首先,作为履约者,中国以“体制内”国家的心态认真履行承诺,发挥了良好的模范作用,将国际贸易自由化推进到新的高度。其次,作为参与者,积极投入到 WTO 的各项职能活动。2005~2011年,中国承担了危机期间的实质贡献者,多哈谈判中的关键协调者和核心决策者。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继续保持市场开放,实现了经济、贸易地位的相对提升,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不仅为 WTO 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也成为抵制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巩固自由贸易秩序的中流砥柱。2012年至今,中国成为 WTO 备受挑战时期的支持者和影响者。随着中国在 WTO 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国际社会对中国解决多边贸易体系治理难题抱有更多期待。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在国内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系列举措也已经对国际经贸自

由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将在多边贸易体制的未来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摘自《东南学术》2018年第5期,原题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与多边贸易体制关系的演变》,约10000字)

1953~1960年安徽农业“三改”

赵 胜

1953~1960年安徽农业“三改”是省委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场农业生产改革运动,是当代安徽史上的大事件。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为抵御灾害、增产粮食,1953年9月6日,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做总结发言时,曾希圣首次在安徽提出农业三项改革,一是改变耕作方法,改广种薄收为精耕细作;二是改变收获季节,尽量避开灾期收获,增加午季收获量,即赶在涝灾集中发生的7月、8月、9月前多收获粮食;三是改种高产作物,如马铃薯、水稻、“胜利百号”山芋等等。1954年元旦,曾希圣在《安徽日报》发表文章,称“三改”的“基本精神和某些办法,特别是改种高产作物,是可以而且应该在安徽全部地区争取实现的”。这样,“三改”范围已不局限于淮河流域,而是扩至安徽全境。“三改”具体内容十分丰富,随着改革的推行,其内容不断得到充实,但其最重要的内容是在淮北推行稻改(即旱改水,改旱田为水田,种植水稻)和在长江流域推行双季稻(以长江流域为主,省内其他地区也有推行)。安徽省委初衷是为粮食增产,一些地区基层干部坚持遵循因地制宜原则,“三改”取得明显成效。但“三改”采取层层摊派任务的做法,后期政治化倾向明显,以致留下沉痛的历史教训,需要深刻反思。(摘自《安徽史学》2018年第4期,原题为《1953~1960年安徽农业“三改”研究》,约8000字)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 督导制度的变迁

周光礼 薛欣欣

教育督导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以关键事件为标志,教育督导制度40年变革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教育督导制度的恢复与重建(1977~1992年),标志事件为1977年邓小平提出恢复教育督导制度的构想;教育督导制度的改革与发展(1992~2012年),标志事件为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两全”、“两基”的任务目标;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督导制度的建构(2012年至今),标志事件为201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的成立。纵观40年变迁历程,我国教育督导事业取得显著成就,实现了从教育督导制度的恢复与重建到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督导制度建构的历史飞跃,督导机构的权威性、督导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大幅提升,督导法制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完善,督导范围实现全覆盖,基本建立起督政、督学、评估监测“三位一体”的教育督导体系。系统梳理与反思我国教育督导制度40年变迁的历程,我们发现: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督导制度,应以教育事业发展为重心,增强督导机构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提高督导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加快督政法制化建设,改进督导方式,健全督导问责机制。(摘自《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原题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回顾与展望》,约12000字)

城镇化视域下的农村教育变迁

刘秀峰

以城镇化的视域去考察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教育的变革历程,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1978~1992年,离土不离乡——农村教育为农服务的探索阶段,农村教育改革的探索主要体现在确立“为农”服务的农村教育办学方向;探索依靠群众,分级办理农村教育的体制;在农村内部进行“三教统筹”的改革。1992~2002年,城镇化加速——农村教育面临困境阶段,虽然在国家强有力的政策推动下,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成效显著,但并不能掩盖农村教育发展的困境,农村教育改革政策必须做出重大调整。2003~2012年,统筹城乡的思路——农村教育政策的调整阶段,教育管理层级不断提高,确

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乡村学校生源减少,调整农村学校布局。2012年至今,新型城镇化——农村教育在困惑中守望阶段,面对传统城镇化中显现的种种弊病,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了走新型城镇化的思想,在此背景下,我国农村教育政策呈现出积极的取向,遏制乡村教育衰败,振兴乡村教育;农村田园化,农村教育特色化初现端倪,一些地方的农村学校自主探索了结合本地特点的特色化教育路子。改革开放40年农村教育的变迁启示我们要以城镇化的思维去预判并破解农村教育问题,正视农村教育城镇化,主动推进农村教育城镇化。(摘自《教育发展研究》2018年第17期,原题为《改革开放四十年城镇化视域下的农村教育变迁》,约8000字)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

孙淑云 任雪娇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历经萌芽与生成—发展与繁荣—衰落与调适—重建与复兴—整合与合并五大发展阶段,跨越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和城乡一体化转型期,嵌入在中国城乡二元分割、固化、解冻和一体化加速转型的体制变迁中,其改革变迁经历诱致性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多元探索与制度变迁失效—强制性制度变迁,改革主体从基层自发探索到顶层政策设计,参保主体从农民社员到全体农村居民,筹资分担从社区互助共济到社会统筹分担,保障内容从初级保健向基本医疗保障升级,建制形式从自治章程到社会政策再到法制,制度结构从残缺到完善,治理方式从基层社区自治到基本医疗保险的法治化、社会化治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60年变迁史,在形式上可以总结为追求建设中国特色的农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历史,在实质上可以归结为农民基本医疗保障的国家治理历史,虽历经曲折,但发展态势良好,逐步形成“参保、筹资、待遇、管理、经办、监督”等核心要素规范化发展的制度格局,并渐次进入全民医保

的法治化新时代。(摘自《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9期,原文约10000字)

我国体育治理的演进

董红刚

我国体育治理演进大体分为五个阶段:政府一元结构、行政动员为主和多部门联合治理阶段(1949~1978年);体育行政部门全权负责、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阶段(1978~1992年);市场主体进入体育治理结构、开启体育法治化时代阶段(1992~2001年);体育行政部门主导治理、市场主体和社会团体趋于弱势阶段(2001~2012年);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治理并逐渐收敛于最优匹配阶段(2012年至今)。两条脉络贯穿始终:一是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二是以全民健身为代表的群众体育,在“体育为国”与“体育为人”中寻找社会认可、国家认同的均衡结果。三个主体复杂博弈:体育行政部门、体育市场主体、体育社会组织依次登台且反复切割边界,寻求内部结构均衡与外部协调发展。在这种框架下,我国体育治理演进呈现出四个特征:渐进性、反复性、导向性、收敛性。体育体现着强烈的国家意志,正因如此,调整体育治理结构、优化体育治理主体才会出现渐进性与反复性,最终政府、社会、市场在不同的体育子结构中收敛于最优匹配,进而建立体育全面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和支撑体系。(摘自《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9期,原题为《我国体育治理演进研究》,约12000字)

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发展40年

林闽钢

40年来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在政府主导下,经由从小变大、从弱变强、从点到面的发展过程,社会救助体系框架基本成型,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的一张名片。1978~1992年,社会救助制度建设进入发展轨道,民政部社会救助相关部门成立,社会救助的自上而下建设有了主管部门。1992~2007年,社会救助

体系的基础开始形成,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获得全面实施,同时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和住房救助等专项制度得到发展。2007~2014年,社会救助体系的临时救助制度得以完善,从2007年开始,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探索建立临时生活救助制度,到2013年底,在短短五年之间全国26个省份都迅速制定或完善了临时救助政策。2014年至今,社会救助体系进入整合和优化发展阶段,《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出台,社会救助体系框架基本搭建形成,多部门社会救助资源获得整合以及相配套的运行机制获得健全。在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中,体现了国家治理的底线思维,社会救助体系已呈现出了多层次、跨部门、强基层的特征。在救助体系设计上,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始,到逐步健全专项救助制度,最后推出临时救助制度,系统构建了多层次社会救助体系,同时从部门救助资源分割转变为部门资源统筹运用;在城乡救助发展统筹上,由城乡分裂、城乡二元制度,向统筹城乡社会救助发展转变;在救助参与主体上,由以政府组织开展社会救助项目为主,向政府主导下的政府和社会协同配合转变,形成了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社会救助新格局。(摘自《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原题为《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发展四十年:回顾与前瞻》,约12000字)

1956~1964年山东省对苏劳务援助

郭本意

1956~1964年,应赫鲁晓夫请求,山东省几经动员派出劳工600人援助苏联,在苏联工业区参加生产建设,接受苏方的生产技术培训。在苏生活期间,很多工人与苏联女工结成跨国夫妻。赴苏援建由赫鲁晓夫主动提出,中国积极参与,赴苏工人人数由100万减到20万,再到8万,最终2000人,数字的递减揭示了中苏之间的微妙关系。赴苏援建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只是很正常的劳务输出,但中国政府受制于历史问题与民族情感,不愿也不能公开宣传,导致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长期鲜为人知,反映了中苏“蜜月”时期双方关系的微妙性。1960年

赫鲁晓夫撤回苏联专家，却默认中国工人继续留在苏联参加建设，中国政府也并没有主动将工人撤离，双方反而续签了合同，直到1964年到期。可见双方都留有余地，并不想彻底交恶，这显示了中苏关系的复杂性。山东省对苏劳务援助，是山东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鲜为人知的大规模劳务援助。这一事件是难得的那个时代两国关系及其变动见证的鲜活个案，是中苏关系史上带有特殊性和典型性的历史事件，从一个侧面生动而鲜明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苏关系变化的复杂轨迹，丰富了那个时代中苏关系史的一些细节和具体内容，透过这些细节和具体内容又生动地反映了那个大的变动着的历史时代。（摘自《安徽史学》2018年第5期，原题为《1956年至1964年山东省对苏劳务援助初探》，约15000字）

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邱观建 于 娣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30年，中国人民站起来当家做主人，开展了有限的社会福利事业。政府开展扶贫济残工作，收容和救济残疾人，兴办荣誉军人学校、盲童学校、聋哑学校、休养院、社会福利院等扶残助残机构。在城市中开办福利企业，为残疾人提供参与劳动的机会和条件；在农村组织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参与集体生产，为无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提供“五保”待遇。中国残疾人事业有了初步发展，奠定了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重视残疾人事业，残疾人组织迅速恢复发展，初步探索劳动福利型发展道路，逐步形成理解尊重帮扶残疾人的社会风气，中国残疾人事业走向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之后，中国残疾人事业迈入组织化体系化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残疾人事业发展纳入国家发展规划，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形成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体制机制，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获得了实质性进展，为国际残疾人事业贡献了中国

智慧与中国经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残疾人事业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向而行，获得了大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残疾人事业发展道路。（摘自《残疾人研究》2018年第3期，原题为《理念、实践、道路：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四十年》，约12000字）

国防经济建设发展的时代特征

解 柏 伟

改革开放40年来，国防经济建设是在世界安全形势和国家社会发展大格局下进行的，既反映了内在运动的规律性，又突出表现了时代特征——国家主导。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规模由小到大，科技创新由弱向强。国家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转变发展方式，经历经济起步、高速增长、科学发展再到转型升级新常态多个阶段，国防经济先后经历忍耐求存、适应两场、跨越发展阶段。国家从优先发展经济战略，逐步过渡到统筹推进、深度融合、协调发展的发展模式。国防经济与国民经济，从争投入、争资源，到互利共赢、相互外溢；从互相封闭、独立建设，到开放融合、共同建设，逐步走上一条良性互动的发展道路。40年前，我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起点都较低，在国防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面临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党和政府着眼国家建设全局与长远发展，针对制约国防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薄弱环节集中发力。改革开放初期，物资匮乏、资本短缺、技术落后，国家不得不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不与国家争财力、争资源，以最大努力开展军队建设。向市场经济转型后，市场的波动性、不确定性，与军队的计划性、指标刚性，产生一定冲突，军队在物资筹措、保障供应和军人待遇等方面，积极寻求适应市场的办法措施，有效缓解了军队保障的矛盾，不断探索出军民结合、军民兼容、军民融合的途径。（摘自《国防》2018年第8期，原题为《改革开放四十年国防经济发展回顾》，约6000字）

1962年广东省“支援前线”运动

姚 昱 万金金

在1962年年中爆发的第三次台海危机期间，为防备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我国东南沿海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紧急备战。在此期间，广东省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支援前线运动，向前线部队提供了全方位的经济支持，为了支持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进行的大规模紧急备战活动，仅广东省展开的支前运动就横跨粮食供应、工业生产、水陆交通等多个领域，花费支出数百万元，动用劳动力数十万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少见的地方国防经济动员活动。这一支前运动对于此次台海危机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此次支前运动的支持下，人民解放军数十万部队才得以迅速部署到位，从而完成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既定战略目标。此次支前运动虽然实现了其支援相关军事活动的基本目标，但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说明了此次台海危机与1960年代初中国国内经济基本状况之间的联系十分复杂。1960年代初中国国内经济困难不仅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根本诱因，也是束缚大陆采取军事反制措施的主要限制性因素。广东省自身也从这次支援前线运动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随后进行三线建设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原题为《1962年广东省“支援前线”运动研究》，约15000字）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对外援助

刘方平 曹亚雄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外援助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改革调整阶段（1978~1993年），1978年以后，在外交服务于经济的理念下，中国对外援助开始进行相应的改革与调整，以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之前的不计经济效益式的对外援助方式开始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低速增长阶段（1993~2003年），经过了第一阶段的调整与改革后，中国对外援助开始进入一个低速

增长阶段，一方面，中国对外援助支出规模实现触底反弹；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援助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继续进行相应的改革。中速增长阶段（2003~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规模开始呈现较高的增长速度，对外援助年均支出规模达到110.2亿元人民币。高速增长阶段（2012年以来），中国对外援助支出规模呈现高速增长态势这与中国新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关系。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对外援助实现了从国际主义到注意内外两个大局、应对内外两种挑战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理念由“共同发展”逐步向“合作共赢”转变；中国对外援助体系由“碎片化”逐步向独立化、战略化方向转变；中国对外援助实践由领域失衡逐步向普惠平衡方向转变。中国对外援助增进了国家利益，成功实现战略转型，促进了援助双方“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形成了“援助+合作”的特色援外模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援外体系，推动了“南南合作”的发展，为全球发展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摘自《改革》2018年第10期，原题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外援助历程与展望》，约8000字）

中国参与中东维和行动的理念与实践

孙德刚 张 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知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从片面到全面、从消极到积极的变化过程。中国参与联合国在中东的维和行动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重要领域，其过程可分为谨慎接触（1979~1987年）、初步参与（1988~2001年）、机制创新（2002~2011年）和主动塑造（2012年以来）四个时期。中国参与联合国在中东维和行动理念、政策和行为的变化，受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海外利益不断拓展和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不断强化等四个因素的共同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立场经历了从消极到积极、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的过程，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渐进过程。随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中国在中东地区奉行“不结盟”、“不寻求代理人”、“不填补权力真空”的“三不”政策,坚持伸张正义、反对侵略、奉行和平主义外交政策,赢得了各方的信任和尊重,使中国在中东维和发挥独特作用;维和已经成为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参与中东维和行动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

实践。中国参与联合国在中东的维和行动不仅展现了发展中大国对中东安全治理的参与,而且成为中国探索“维和外交”、运筹与美、欧、俄、非盟和阿盟等大国和地区组织战略合作的重要平台。在维和实践中,如何做到既“出钱”又“出人”,既“出思想”又“出方案”,是新时期中国从“维和大国”向“维和强国”迈进的重要任务。(摘自《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5期,原题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联合国在中东维和行动的理念与实践》,约15000字)

【学术动态】

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

2018年1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在京举行了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座谈会。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云之子陈元,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刘少奇之子刘源,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国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杨胜群,国防大学原副政委李殿仁,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曲爱国出席了会议。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后人也应邀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齐德学,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张晓龙,以及刘少奇家乡有关部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分会代表,中央机关、部队、高等院校的学者和研究生,媒体记者等共约60余人。会议由国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主持。

座谈会上,曲爱国、李殿仁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历史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永玺、当代中国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主任李正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德山(张冬冬代读)、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原局长罗雄分别做了主题发言。

刘源在代表家属致词时首先向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感谢。随后,他从与父亲相处的时光和家教家风等侧面,回顾了父亲对他们的严格要求和殷切希望。

最后,朱佳木代表国史学会讲了话。他说,今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国史学会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学术座谈会,以此缅怀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特别是新中国建设立下的丰功伟绩,同时学习他的高尚情操、宝贵品德和优良作风,把他身上体现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作为党的传家宝一代代传承和发扬下去。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邓小平、陈云、朱德、周恩来同志的座谈会上先后发表了五个重要讲话。把这些讲话联系起来学习,不难看出它们贯穿着的一条红线,那就是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事业、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厚感情,对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流和本质及其不同历史时期相互关系的准确把握,对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老一辈革命家伟大精神、崇高风范的深刻理解。我们今天纪念刘少奇同志,就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讲话精神为指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把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奋斗!(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 http://hprc.cssn.cn/gsyj/yjdt/tbtj/201811/t20181120_4778381.html, 2018年11月28日,原文约1200字)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5期要目及摘要

· 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 ·

用中共十九大精神推动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建设

朱佳木

〔摘要〕推动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建设，是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者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的一项特殊任务。要用中共十九大精神拓宽视野，打开思路，发现更多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者可以研究也需要研究的问题；思考当代中国史的分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史的分期问题；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把新中国成立近70年的历史贯通起来总结；并加强对习近平关于树立正确历史观、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等重要论述的学习。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要抓住全国上下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历史机遇，推动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的学科体系建设，促进当代中国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繁荣与发展。

·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 ·

锦绣辉煌 扬帆起航

——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

王柏中 付广华 欧阳常青 罗彩娟

〔摘要〕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发展实现大跨越，由原来的“经济末梢”成长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成为民族自治区跨越式发展的典型；民族团结铸就模范区，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持续发展；文教进步成就新高度，文化建设实现飞跃发展，教育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边境稳定迈向新境界，兴边富民行动不断深化，边境文化和谐共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广西的成功实践，形成了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文教进步、边境稳定的新局面。

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实践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发展历程、辉煌成就和历史经验

郑彦卿

〔摘要〕宁夏回族自治区自1958年成立以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下，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民族团结不断巩固，科教文化事业全面进步。自治区成立6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正确的，只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民族地区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把发展地区经济放在首位，坚持依法治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民族地区的发展前景就是光明的。

·政治史研究·

论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贯彻落实

邬思源

〔摘要〕《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后的两三年，全党掀起了贯彻落实《准则》的热潮，如召开座谈会，集中开展学习教育，发布各类通知、指示等配合贯彻落实《准则》，严肃查处违反《准则》的不正之风。通过贯彻落实《准则》，全党对端正党风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普遍提高；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走上正确轨道；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不断提升。《准则》的贯彻落实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必须高度重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必须把政治纪律放在首位；要建立符合国情、党情的纪律检查工作领导体制；重视贯彻落实的检查。总的来说，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准则》的贯彻落实促使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在党的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文化科技史研究·

中国科学基金制的先行先试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的历史考察

王 新 张 葵 唐 靖

〔摘要〕1981 年，由 89 位学部委员建议并经中央批准而设立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历时四年完成了中国科学基金制先行先试的使命。它不仅打破了原来 30 多年的科技拨款制度，加速了中国科学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促成高校成为国家基础研究的主力军，确立了科学共同体的自治与自我管理，推动了科学基金制在国家层面全面实施，对中国科学基金制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奠基性作用，而且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探索性贡献，促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社会史研究·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内蒙古安置自发性移民研究

仁 钦

〔摘要〕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初期，因自然灾害等原因，河北、山东等地的大量移民自发性移入了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安置了移入内蒙古的自发性移民。通过自发性移民的安置和救济工作，使他们渡过了难关，对恢复生产和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在客观上支援了自发性移民原籍地区的救灾等工作，增强了地区间与民族间的团结。

北京市 1959 年精简城镇人口研究

王 瑾

〔摘要〕1958 年北京市各领域的“大跃进”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失、城镇人口膨胀，引起市场供应紧张等一系列问题。因此，1959 年北京市通过处理私招人员、整顿劳动组织等措施初步精简了城镇人口。这次精简城镇人口工作曾一度取得明显成效，为 20 世纪 60 年代初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积累了宝贵经验。

·国家社科基金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防汛动员工作的困境与应对

——以黄河下游地区为例

郭赛飞

〔摘要〕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防汛动员工作中存在的干部群众积极性不高、生产和防汛工作矛盾突出、麻痹思想和经验主义思想蔓延等困境，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应对，成立了黄河水利委员会，构建了自上而下的防汛指挥体系，开展防汛宣传、时事教育与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提高工资标准与实施物质奖励。这些措施增强了群众的防汛意识，有效缓解了防汛与生产工作的矛盾，提高了防汛工程的质量和工作效率，促进了工程技术的革新与推广，丰富了防汛工地的文娱生活，稳定了农民的生产情绪，安定了社会秩序，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良好形象。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防汛动员工作是成功且高效的，其重要原因在于将防汛定位为一项经常性的重点工作，反映了这一时期水利工作由暂时性、应急性向经常性、建设性转变的趋势。

20世纪50年代山西农村扫盲与农业生产研究

苏泽龙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社会发展亟须解决农业生产方式落后、民众文化知识匮乏等问题。通过在农村开展识字扫盲工作，农民群众初步掌握了文化知识，纠正了对农业生产的认识，改变了农村几千年来的耕作方式，推动了农业新技术的普及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农民识字人数的增加、农民知识群体的建立推动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外交史研究·

中国纺织援非的历史和作用论析

杜英 陈金龙

〔摘要〕纺织援非是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1961年中国援建加纳一座纺织厂，开启了中国纺织援非的历史进程，20世纪60~70年代是中国纺织援非的高潮阶段，80~90年代是技术合作、合资经营阶段。21世纪以来，中国纺织援非企业虽因非洲受援国政局动荡、进口二手服装泛滥、本土管理技术人才不足等因素陷入困境，但其作用有目共睹：中国纺织援非项目帮助非洲国家利用本国资源推进工业化；对中国经济援助非洲等有借鉴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施惠受援国和互利双赢的援助目标。

·海外观察·

《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1978~2002年）

付正

〔摘要〕《中国季刊》作为海外当代中国研究领域颇具代表性的期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保持了密切关注。综观1978~2002年间《中国季刊》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文章，主要集中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及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反思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海外学者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其研究也存在着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和局限，这就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辩证地分析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史参阅》2018年要目

特别推荐

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依据和意义

——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一点体会

朱佳木(1-1)

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张星星(1-7)

新时代中国强军兴军的科学指导思想

齐德学(1-10)

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

陈扬勇(2-1)

深刻理解十九大报告中的历史观

李殿仁(3-1)

新时代历史学的新使命

姜义华(3-5)

改革开放的三个历史节点

徐光春(4-1)

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若干思考

周新城(4-2)

推动当代科技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朱佳木(5-1)

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

高长武(5-2)

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宋月红(6-1)

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辩证思维

王炳林 徐春生(6-4)

本期关注

全面完整地维护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新中国“两个30年”辩证统一的视角?

梁柱(1-13)

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 坚决抵制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李庆刚(1-18)

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论要

王炳林(2-6)

关于党史研究创新的一些思考

王相坤(2-12)

历史的基本结论和新道路的最高范畴

——对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命题的一点认识?

冷溶(3-9)

提高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和水平

曲青山(3-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与经验

王爱云(4-7)

理直气壮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王玉周(4-14)

如何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性质

刘明明(5-7)

农村改革是“边缘革命”还是“核心突破”?

李嘉树 董国强(5-12)

亲历者说

缔造新中国的历史盛会

——回忆采访首届政协会议及开国大典

季音(1-21)

忆周总理对智利阿连德政权前途的准确预言

庞炳庵口述(1-24)

关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共识的由来

唐树备(2-18)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重要原则

- 一个参加《公约》谈判的老外交官的回忆 孙 林 (2-25)
- 参加筹建第二个核武器基地 李修福 (3-16)
- 亲历宁波计划单列 葛洪升 (3-20)
- 我所经历的企业整顿与改革 袁宝华 (4-29)
- 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 林重庚口述 苏国利、吴素萍整理 (4-25)
- 在二机部第九研究所 程开甲口述 熊杏林整理 (5-20)
- 坚守的生命线——中国民航安全这些年 李家祥口述 于洋采访整理 (5-26)
- 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四次出国考察 袁宝华 (6-11)
- 农民“财政账本”内容的变迁 华兴福 (6-19)

史海烟云

- 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演进 原 新 (1-29)
- 科学与政治：1957年台湾地区对李政道、杨振宁的争取 黄庆桥 (1-34)
-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传奇 韩洪泉 (2-29)
- 一段隐秘的历史——美国在台湾的核部署（1957~1960） 梁 志 (2-33)
- 云山首捷——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战役 王正兴 (3-25)
- 对外开放——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 陈 思 (3-30)
- 回望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 王扬宗 (4-35)
- 中国空军发展预警机的艰难历程 陈 辉 (4-39)
- 科技40年：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 陈 冰 (5-30)
- 独具历史特色的七七、七八级大学生 钱 江 (5-34)
- 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始末 张东明 (6-22)
- 新中国第一路跨越巴山蜀水 田 姝 (6-28)

人物春秋

- 毛泽东和他的时代 陈 晋 (1-40)
- 公用浴室修建前后——周恩来的一次调研 孟 红 (1-47)
- 邓小平反对高级干部特殊化 张文良 (1-48)
- 周恩来与调查研究 费虹寰 (2-39)
-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光辉榜样 李洪峰 (2-41)
- 毛泽东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智慧 李 振 (3-35)
- “万方乐奏有于阕”——毛泽东看少数民族文化 陈 晋 (4-47)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 张 曙 (4-49)
- 一个伟人与普通一兵的神交 余 玮 (3-38)
- 新中国成立后重大军事事件中毛泽东战略决策特点及启示 刘征鲁 (5-38)
- 刘华清与我国的海军战略 吴殿卿 (5-43)
- 毛泽东：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胡新民 (6-31)
- 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 刘 源 (6-35)

海外反应

- 近五年国外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动向分析 孙钦梅 (1-49)
- 中国对外援助的扩大与国际开发援助的界限 渡边紫乃 (2-46)
- 中国对缅甸的外交政策:过去与现在(1949~2010) 〔泰〕余体珀·柯拉迪甘 (3-44)
- 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七种叙事 戴维·凯利 (4-52)
- 德国主流网站 WEB.DE 呈现的涉“一带一路”舆情分析 何 兰 马秀秀 (5-50)
- 浅析兰德公司的中国军情研究 陈 晴 肖 欢 (6-38)
- 美国联盟战略与中国周边环境 仇华飞 (6-44)

成果举荐

- 《钓鱼岛问题文献集》出版发行 (1-58)
- 读懂香港这本深奥的书的一把钥匙
- 评《“一国两制”与基本法: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邹平学 (2-48)
- 研究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新领域
- 评《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时期的中美竞争》? 牛 军 (3-51)

学术动态

- 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新中国历史研究进一步发展
- 国史学会召开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 (1-59)
- 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 (6-56)

统计资料

-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按家庭卫生设施类型划分的住户结构 (1-20)
-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住房数量与结构构成 (1-39)
-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农民生活条件 (1-60)
- 2017 年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货物进出口额及其增长进度 (3-50)